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285 期

2019年 8月 15日

\*\*\*\*\*

### 目 录

#### 【论 文】

我们认识中国，为什么总走不出西方的框架

赵汀阳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探讨

——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解析为例

孙 勇、王春焕

“纯洁”还是“混合”——近代汉人学者的“民族史”写作

常 宝

家庭的民族特征与藏族大学生的高中学业成就

陈彬彬、陈 进

欧洲文献中的土伯特：以十三至十八世纪为重点

陈 波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论 文】

# 我们认识中国，为什么总走不出西方的框架<sup>1</sup>

赵汀阳

摘要：中国到底是什么？有过无数的解释，有过西方解释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解释，我是看过不少。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大多数都是一个描述，描述中国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它没有解释说中国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大概是 1993 年之前，我基本上是属于做研究西方哲学的，但是 1993 年之后，我主要转向研究中国的思想。在 1995 年的时候，北大的朱苏力教授有一次提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一下，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提供给世界的？这个问题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很容易变成研究中国的一些土特产。朱苏力的这个问题是想问，中国有没有一些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普遍性的一些东西？

我应该说，自从转向中国的研究以来，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以不同专业的朋友为师，因为中国是一个综合的存在，我必须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不管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考古、古文献、中国的历史，诸如此类。

那么，中国到底是什么？有过无数的解释，有过西方解释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解释，我是看过不少。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大多数都是一个描述，描述中国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它没有解释说中国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它告诉你中国长这个模样，这个我们知道。我感兴趣的是，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成现在我们大家所描述的这个样子？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向心力的一个漩涡，这个漩涡不断把周边各个地方各个文化卷到一起，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巨大的时空的存在。并且漩涡的特点就是一旦卷进来就无法脱身，它是一个向心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遗产，就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大的遗产。

所以，我也把我所做的试图重构中国的历史性，这样一个工作理解为是一个祭祖行为，向祖先致敬的行为。为什么中国需要重构它的历史性？

在古代没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现代产生的，是因为现代以来中国已经失去了以自身逻辑来讲述自身故事，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或者说一种知识生产上的立法能力。客观原因应该这么说，在现代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历史，但是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已经萎缩、蜕化为西方征服世界史的一个附属或者分支。也就是说，现代的中国史其实是西方史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自己讲述自己的能力。

当然了，我们肯定都会意识到这个情况正在改变。今天，中国逐渐拥有了自己，重新拥有自己生长的能力和方式。当然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改革带来的成果，但是改

<sup>1</sup> 摘自赵汀阳在 2015 京城国际论坛“何谓中国——中国的生长方式”分论坛的发言。

<https://mp.weixin.qq.com/s/ajheLH1-IQGeAtSpMD4--Q>



革一开始，中国很弱，中国真正获得了自己生长的方式，也就是不超过十年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非常需要理解我们的祖先，理解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 共识与偏见

关于古代中国，一般来说有三个共识，大家都是共同承认的。一个是说中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据说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第二个是中国具有兼容性，就是无所不包。同时还有第三个更特别的特征，中国是一个非神性的国家。因为和西方比，中国缺乏一个一神教，缺乏表达超越领域那样的一神教。中国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中国文化也有这样一个现象。

这三个共识，前面两个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一个描述，我们要解释它为什么是连续不断的，并且为什么是兼容的？第三个假设，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主要是一个西方看法，在西方看来，如果你没有一种宗教，或者没有一神教就是没有神圣性。这一点我深表怀疑，中国的存在是另外一种神圣性，不需要表达为宗教，这也是我试图论证的一个问题。

我就是要追问：何处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信仰？我要分析这个行为的逻辑以及跟行为逻辑所一致的那些证据。什么是行为逻辑？也就是符合行为者的最大利益的选择，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或者换句话说，当一个行为者拥有最大能力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这样理解古人，理解古代每个朝代，每个当时的部族。那些部族他们分别在做出集体行动的时候，他们到底追求什么？就是要侦探这样一些问题。

做侦探要排除偏见。

第一个排除的就是自现代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潜意识会被迫使用的，由西方知识生产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概念和知识。我们用这些东西来分析中国，比如说过去曾经一度很流行，说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这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中国根本没有封建社会，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我们的封建指的是先秦的分封制，那个跟西方封建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把封建社会指中国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时间，那就是更加的不靠谱。当然幸亏这样的不靠谱观念，现在已经得到了纠正。

同等的的不靠谱还流行过，说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这也是完全不靠谱。说我们小时候读的历史都是农民起义，其实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不一定是真正的纯朴的农民，基本上是流民，所以这完全不靠谱，这都是西方推销给我们的观念。

包括今天应用的仍然发挥作用的，比如帝国、朝贡体系、东亚、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这些都是西方用来解释中国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是不符合事实，不靠谱，和中国的对不上。这些概念不仅误导事实，我们还要知道还有政治的附加值，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很丑恶的故事，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当年我书，就用了帝国这个概念。过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不对。我们中国是帝国吗？帝国的标志就是迷信武力的征服，并且是向外看，是一个向外拓展的国家，那才是帝国。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缺乏以上的两个性质。我们怎么管中国叫做一个帝国？其实古代中国只不过君主制。所以我后来在新的书里面进行了纠正。当然没有纠正过来的还有很多，因为这一百年我们已经被西方重新塑造，如果有这些不靠谱的概念，也请大家原谅，我一个一个的改掉，慢慢的改正，这是一个偏见。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偏见，就是我们在理解古代历史的时候，非常容易以现代的事实倒影为古代的事实。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国家是有主权，是民族国家，似乎应该拿这些东西去倒影到古代，那就很麻烦，古代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这个概念，不过是你是山东人，他是山西人，就是不同地方的人。在今天都给搞成民族，搞成民族之后告诉你，你一定就有民族主义，中国古代就变成民族之间的竞争。古代中国这片土地上只发生过政权之间的战争，各个英雄都是忠于自己的朝廷和君主，而不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些统统不存在。这些都是把现在的事实倒影回去，这也是我们需要纠正的。

还有一个偏见，我管它叫地方主义的偏见。这个包括比如说流行的，就是汉族观点，汉人观点，儒家观点等等。因为在中国主体中，人数最多的就是汉人和儒家文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习惯于站在中原，以汉人的身份来看中国。那么这样的话，有时候正好应和了西方的叙述。在西方看来，长城是中国的边界，所以我们越看越小，这样是不公平的。如果我是一个蒙古人，我会怎么想？我站在长城外面难道不能往里面看？我难道不能认为中原应该归我统治？当然可以。当年忽必烈就是这么想的，皇太极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不能够局限地站在一个地方去看问题，我们要站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点来看中国。我觉得，这也是需要纠正的一个偏见。

## 中国的漩涡

我们排除这些偏见之后，我理解的中国就是一个自古以来连续动态博弈的游戏。大家为什么有热情要参加这样一个博弈游戏？或者说为什么大家想参赛？参加中国这样一个比赛？这些都是要值得研究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游戏在运动方向上，是一个由内向外走的向度，还是由外向里走的向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中国的学者，包括我曾经也是这样，我们忍不住从汉族的角度、从儒家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而情感化地想象，中国的文明一定是由中原这个地方向外扩张的。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走，最后终于走到这么大的范围。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具体说来，是在我说的中国漩涡形成之前，中国是从中原往外传播的。也就是说在远古的中国，比如说早到新石器时代，或者早到夏商那个时代，夏商周。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由中原向外发生影响。但是关键是那个时候，还不是中国。那个时候所谓中国就是中原一点点地方，其他地方就是天下。在先秦时代，应该说是一个中国管理下的天下。

秦朝奠定了中国，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才真正形成、定义了中国。这个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脱身的漩涡，这个漩涡的原因要往上追溯。但是一旦形成漩涡，中国就变成一个各方的力量由外向中间走的这么一个路径，形成了向心力，所以中国越变越大。这能够解释一个难题，就是中国是非侵略性的，但是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中国不去侵略，却越变越大，这样一个悖论如何解释？

我相信我的这个漩涡模式，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中国变大是因为各方力量不断被卷入这个漩涡。为什么会形成漩涡？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漩涡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中原地带拥有当时最好的物质条件，还拥有最丰富的精神世界。各个部族到中原来，逐鹿中原，抢夺中原，抢的不仅仅是地面，更主要就是抢夺物质生产的能力以及精神生产的能力，或者是知识生产的能力。拥有了知识生产、拥有精神生产，就可以把自己合法



化，而且能够支配整个中国，支配所有地区。所以漩涡的吸引力就来自于此，它是一个最大的物质生产，同时也是一个最大的精神生产。

## 中国的神性

那么，中国漩涡的核心——精神世界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就要解释中国的神性问题。

中国在早期中原发展出来的问题，已经奠定了是一个天下。天下是以天对应，也就是说天下是要配天的，要与天相配。天是神圣的，如果我们天下的存在方式跟天相似，那么它就因为配天而具有神性。所以中国的神性是这么来的。

中国的房子为什么盖成这样一个样子？下面有一个底座，底座就是大地，上面这个盖就是天，所以我们的房子本身就是天地，就是诸如此类的细节都表明了，中国这个文化的运动方式就是要把中国的存在方式，塑造一个配天的存在，所以它是神圣的，尽管它不是一个宗教。

在这个侦探故事的结尾，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经历了一个骑驴找驴的故事。因为我们把中国当成一个不加思索的东西，所以老去寻找其他事情。**

我在过去一直没想通，中国的信仰是什么？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不可能没有信仰，可是中国的确没有一神论的宗教，这一点使我迷惑很长时间。我们中国的信仰是什么？最后我发现，这是一个骑驴找驴的故事，**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中国的存在这个实体，这个巨大的时空存在，就是中国的信仰。所以我们信仰的就是中国！中国存在的历史性，就是中国的宗教。**

前不久，我跟法国的历史学家谈到这个问题，他也说中国没有宗教。我说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就是中国的宗教。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中国存在的时空，中国的整体性，整个都是中国的神庙。我们就住在中国的神庙里面，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结论。

中国历史性的演变，大概可以这么说。我概括为先秦阶段，也就是说从旧石器、新石器一直到秦始皇之前的这段时间，叫做中国的天下，也就是说中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那么从秦汉到清末这一段，我把它说成一个内涵天下结构的国家。为什么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其实不是前一阵流行的文明国家，这个词太模糊，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好像别的文明不是文明，这个听上去不太礼貌。我觉得不是这样，**中国是一个以天下为结构的国家，或者说以世界为模型的国家，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性质。**

到了清末民国以来，现代中国就非常萎缩了，已经萎缩为天下里面的中国，也就是世界里面的一个国，一个普通的国家。

那么中国未来的命运是什么？或者说中国的天命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也许可以指望，现在中国已经缩小到一个最弱的地步，是天下里面一个普通的国家。那么下一步，当中国重新进入生长，重新进入青春期、生长期，我们中国是否能够由天下里面的中国，重新生长为一个内涵天下结构的国家？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是不是还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的天下，中国来建立一个世界的秩序？

当然这个事儿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梦想，也许更正确的说法，我想引用一下吕不韦。吕不韦说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么世界就是所有人的世界。

谢谢大家！





## 【论 文】

#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探讨<sup>1</sup>

——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解析为例

孙 勇、王春焕<sup>2</sup>

**提要：**李安宅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边疆性”概念，并且认为经过一系列的边疆社会工作，可以使“边疆性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这个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创新，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探究意义。对于李安宅的“边疆性”与如何消解“边疆性”的命题，曾经在中国大陆学界学人中引起过一定的关注，但随之未能引起广泛的讨论。对所谓的边疆性进行解构，应当对应地看到现代性即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其观念所导致持续进步的社会体验，早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而缺乏这种依靠科技而持续进步的地区则呈现出边疆性来，民国时期的所谓边疆在相对意义上是落后地区的代称；只有进行对比的双解构，才能得出何谓边疆性，何谓边疆性逐渐消失的结论来。人们今天探究“边疆性”这个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那个时代中国学人对边疆研究关注的缘由，有利于我们今天对边疆学原理研究的进行，有利于现今中国新边疆观研究得其学理构成的启发。因而，“边疆性”的内涵还未被学界充分认识，这个命题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边疆研究；李安宅；边疆性；现代性；边疆理论

### 一、边疆性是边疆研究中一个值得探究的概念

在近现代中国发生的三次边疆研究高潮<sup>3</sup>，都是与国运紧密联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的笼罩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中国再次面临着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巨大危机，“救亡图存”的任务又一次摆在国人面前。学界继清末兴起抵御列强的边疆研究之绪，在更大范围内显示出超常的学术热情，边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进一步拓展，各地陆续建立了有关研究机构和创办学术刊物，有的机构与刊物还得到了政府的资助。<sup>4</sup>后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作检索，认为那个时期全国涉及边疆研究的机构众多，刊物也达百种之多，<sup>5</sup>可以认为，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人员以学为国，形成若干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sup>6</sup>当时的一些大学社团和学者受“西学”影响，将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运用在研究之中，收获颇丰。对照清末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时，研究者多在史地研究方面浸润且研究方法不多的局面，在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时的研究者，借助“西学东渐”之功，将大量现代学科引入研究，更具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在此期间，有的学者能够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提出研究的目的，创新了一些边疆研究的

<sup>1</sup> 本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sup>2</sup> 孙勇，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王春焕，西藏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sup>3</sup> 厉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

<sup>4</sup> 林恩显著：《边政通论》（台北，1989年），第17—18页、第252页。

<sup>5</sup> 房建昌：《简述民国年间有关中国边疆的机构与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sup>6</sup> 孙勇、孙昭亮：《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巡检述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概念。例如，吴文藻、杨成志的边政概念，其新的内涵外延当时得到学界与政界的公认，还有李安宅在其专著中提出的“边疆性”也是一个新概念，具有新的内涵与外延。需要说明的是，几十年之后袁剑在 2010 年所提出的“边疆性”概念，<sup>1</sup>与李安宅在 1944 年所说的“边疆性”表面上并没有顺承关系。袁剑的“边疆性”明确的是在清代中国的国家战略问题下的概念，即“指在清代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对中国自身边疆问题的多角度的、具有反思性的整体性操作战略。”袁剑的观点起于对“新清史”的研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与 20 世纪 30、40 年代吴文藻、李安宅等人的边疆研究新概念，即“边疆性”多少还是有关系的。限于本文论述范围，对袁剑的论题将另行文讨论，凡与李安宅学术无顺承关系的其他学者提出的“边疆性”概念也略过不论。

著名学者李安宅，生于河北省迁西县洒河桥镇一书香世家，自幼便有优于一般家庭的教育条件，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中文开蒙到接受“新学”的学业，1926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多次出国学习交流，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造诣，广泛参加过中国边疆实地调研，1941 年任教于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并负责该所工作，1950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政策研究室工作，进藏后在昌都、拉萨等多地任教，后返回内地参加西南民族学院教学活动，1963 年任教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英语并整理其旧作，其在学术生涯中所做的贡献巨大，所提出的观点至今依然对边疆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李安宅是民国时期的“华西边疆学派”<sup>2</sup>的中坚，也是这个学派后期的领军学者和代表人物，<sup>3</sup>中国大陆学界中也有将其归到燕京人类学或华西派人类学学者之列的。

从《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sup>4</sup>《李安宅与华西派人类学》<sup>5</sup>等文献资料中，可以大约看到李安宅与当时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们多有交集，与陶孟和、顾颉刚、吴文藻、罗忠恕、张逢吉、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等人多有来往，也与林耀华、柯象峰、徐益棠等人有学术交流的过往。李安宅对吴文藻等人倡导的边政学（边疆政治学）持支持的态度，也与顾颉刚等学者有着“裨补民族复兴之工作，俾尽书生报国之心”的相同追求。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国政府及其部门的西迁，有一批大学随之迁到西南后方建校，落地之后便陆续开展了各项教学与研究，其中迁建的华西、齐鲁、金陵、金陵女子大学等校，在成都继续进行边疆研究并组建有关研究机构。1941 年，这几所大学发起成立的中国边疆研究学会，成为当时迁建学校中在边疆研究上有代表性的机构之一。<sup>6</sup>20 世纪 40 年代初，以边政作标志的中国边政学会，编辑并定期发行综合性刊物《边政公论》，对中国边疆研究与普及等方面的工作大有促进。李安宅本人为《边政公论》创刊号撰稿，以及之后多次在《边政公论》上发文，均以少数民族地区居住的边地研究为内容，具体介绍了他本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

由于李安宅在学术上的影响力，华西协合大学于 1941 年聘任李安宅为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次年该校组建华西边疆研究所，由校长张凌高兼任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李安宅任该所的副所长，但实际主持该所的研究工作。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期间，李安宅多次深入到中国西部藏地调研，发表有关调研报告和论文；经多年积累，其撰写集结成的《边疆社会工作》专著于 1944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2 年重版。从那时起到现在，仅在这个命题上看，李安宅系国内第一个提出“边疆社会工作”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将“边疆性”与“消除边疆性”命题同时作

<sup>1</sup> 袁剑：《“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sup>2</sup> 周蜀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之再诠释》，《中华文化论坛》2010 年第 3 期。

<sup>3</sup> 汪洪亮：《李安宅的学术成长与政治纠结——两个版本自传比较阅读札记》，《民族学刊》2016 年第 1 期。

<sup>4</sup> 汪洪亮：《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民族学刊》2013 年第 6 期。

<sup>5</sup> 参阅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10 年。

<sup>6</sup> 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论证的学者。李安宅在该书中明确提出：“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即在边疆性之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sup>1</sup>”

李安宅认为边疆的“边疆性”之所以能够逐渐消失，在于：“由着我们的协助，促动边民的自助，而使边疆工作者成为一般的专业工作者。”“到了那个时候，便不是边疆工作，而是各种的专业工作，如医药、工程师、畜牧师、工业化学家之类的工作，这些工作，只有其各行的技术问题，再不必兼为边疆而有的适应技术。<sup>2</sup>”简而言之，在如此这般的过程之后，“边疆性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了。以今天的学术研究视野和方法回望，李安宅所说的“边疆性”不宜简单地归于“社会工作”的范围，似应有着较深的含义。从笔者的角度看，其“边疆性”究竟是对边疆的一种地域性社会状态的描述？还是对边疆工作（具体到社会工作）内容与性质的一种框定？或者是对依附于边疆问题上诸多对策的归总？甚至是在哲思之后对边疆工作涵义所做的意味深长的揭示？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如果这些询问都能够找到答案，对李安宅学术思想的研究来讲，无疑是深掘出活泉一眼，探究出他以及同时代相关学者从事边疆学术活动的目的性。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学界难以达成共识，至少我们能够就“边疆性”这个概念进行厘定，有利于边疆学原理研究的进行，有利于现今中国新边疆观研究得其学理构成的启发。应该看到，由于这个概念涉及到当时国人对边疆属性认识，也涉及到后人边疆研究的视角，包括今天我们是否需要打破边疆研究的某些窠臼，推进边疆研究理性的新认识，因而“边疆性”这个命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 二、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中的边疆属性认识

边疆性概念，是人们对边疆现象的属性认识，有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综观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界，受当时外国学者（尤其是在华传教士学者）的影响<sup>3</sup>，确定以少数民族地区为“边疆”的观点以至于滥觞，即多数学者乃至文人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同于“边疆”，无论是处于腹心地区还是边缘地带，只要杂居或聚居有少数民族，都谓之以“边”。例如著名文学家（也是历史文物研究家）沈从文的作品《边城》，就取材于中国腹地川湘交界的土家族、苗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即是明证。抗战胜利之后，有边疆研究学者提出过这样的研判：“边疆所以不与内地相同的缘故，就其自然条件而论，不在方位，而在地形；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sup>4</sup>”李安宅在其他人奢谈中国陆疆之“边”时曾明确指出，“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如东南各省以海为界，本即国界，而吾人均不视为边疆，川甘青康地在腹心，反称之为边疆，诚以农耕畜牧之不同，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所以分也。<sup>5</sup>”李安宅敏锐地发现和指出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学界能够纠正这种谬识，包括李安宅本人亦不能突破这个窠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所做的研究基本上就在“川、甘、青、康地腹心”，

<sup>1</sup>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79-8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sup>2</sup>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79-8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sup>3</sup> 例如澳大利亚人叶长青（J. H. Edgar）是中国内地会的外籍传教士，他在20世纪初来到华西地区活动，曾多次前往康定、理塘、巴塘等地考察，将这些地方视作中国的边疆。1922年3月，一群来自英、美、加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史称“华西边疆学派”，对后来的国内学者影响很大，1930年初学会开始吸纳中国学者加入，开启学会本土化进程。40年代中国学者成为学会学术研究及组织机构中的主力，展示了学会本土化发展趋势。著名学者李安宅、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玉文华等人是“华西边疆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参见周蜀蓉《基督教与华西边疆研究中的本土化进程——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sup>4</sup> 孙家俭：《两年来从服务工作中所得到的新认识》，《边疆通讯》1946年第7期。

<sup>5</sup> 李安宅：《实地研究与边疆》，《边疆通讯》第1卷。





依然被人们称之为“边疆研究”，他自己也是在这些地方的研究中提出了消除“边疆性”的命题。这样似为悖论的现象为何能够产生，并且延续至今，例如当今学人中依然有专注于省界边地研究的，这个现象值得考量。

尽管民国时期没有进行官方正式的民族识别活动，但在民间对族群的“我识”与“他识”是广泛存在的，其中又多有歧视性的称谓，学界、政界多次提出要纠正族群之间的识别用语，取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称谓，并且在政府行为中首先在学校教育和书籍出版中得到施行<sup>1</sup>。在这一时期的学界，对是否实行民族识别众说纷纭，多数人倾向于不搞或不宜搞民族识别，杨成志直截了当地提出“同生长于本国领土内之人民，均是中华民国国民，在理论上，实不必有民族之区分，况值此大中华民族正处危急存亡当中，更不宜有汉、满、蒙、回、藏、苗、夷界限之划分。”<sup>2</sup>然而，由于历史的积淀，对不同于中原地理风物的地方视之并称之为“边”的做法并未有多少改变，可能有“因为当时的民族问题很敏感”的因素，各界都尽可能不以“民族”为题去探讨相关的学术问题。<sup>3</sup>但研究还是要做的，于是民国时期以“边地研究”代“民族研究”逐渐成风，从事对“川边”、“藏边”、“滇边”等民族调研的学者数不胜数，眼界以及研究工作几乎集中在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

囿于当时的视域，中国海疆问题少有人研究，尽管早在1903年，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论文提出了中国海疆与中国命运的关系，“海权”问题引起了部分学者与社会贤达的关注和附声，但在陆疆问题研究上的著述依然较多。1928年，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引起了政界、军界与学界的关注，随之做海军军事对策研究的人增多<sup>4</sup>，但当时无论是海疆研究还是陆疆研究，在边疆的属性问题上，研究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边疆现象的学理分析——皆因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够。在中国这样陆海地理复合体的国家，自古以来政学两界更为重视的是陆疆的缩盈，亦即十分重视国家政权对陆地疆域的控制，<sup>5</sup>对陆疆边缘地区问题的研究始终是第一位的。近代中国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中，研究者们多数集中于陆疆尤其是对西部边疆的研究<sup>6</sup>，至民国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时依然如此。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学界集中于对中国陆疆边缘地区西部的研究，与抗日战争时期对学术相关研究的需求相符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李安宅在当时的环境下，基于陆疆所提出的“边疆性”的命题，似是顺理成章的。

从国家发展形态的辨析上看，绝大多数国家以陆疆建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规律，中国自古以来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大体继承了清朝的疆域，其时政界和学界也基本达成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中国国家发展前景的共识。如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宣布：“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孙中山的宣言书的精神相一致，提法与条款上写的更为完善，其中对当时的国家领土和议会形式均有明确的规定。<sup>7</sup>民国政府的临时约法宣言，表明国家建构的大体原则与方向已经确立，而进一步的实践是需要时间的，以致于学界的研究需要逐步理清各个民族居住地与

<sup>1</sup> 娄贵品：《国民政府改废少数民族称谓的历史考察》，《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sup>2</sup>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sup>3</sup> 王利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sup>4</sup> 史滇生：《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sup>5</sup> 清代“塞防”与“海防”的争论，最终以“塞防”观点占了上风，成为国家战略的一种抉择，即是这种理念的反映。参阅史绍良、吴红松：《以地缘战略为视角解析清末海防与塞防之争》，《文教资料》2010年第20卷。

<sup>6</sup> 王鹏辉：《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sup>7</sup>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自行定之。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



边疆地区关系的性质。<sup>1</sup> 以此为观，政界与学界那时在对中国的民族和国家的认识上既有很大突破又存在一定的局限。突破，在于接受了外来的新思想，推倒了数千年的封建国家体制，以共和的形式建国；局限，在于“居中守边”的陆疆条件未变，对如何处理共和体制下的陆疆边缘地区的事务，无论是理论准备还是实践总结都只能如此。延伸到对国家边疆问题的研究上，这种局限性在理论研究上明显受到西方人文学科的影响，依照这些学科的方法，必然要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诸多因素纳入边疆研究之中，尤其是要对民族以及文化进行差异化的区分；有中国传统文化底子的学者，又间接地揉入了中国传统的“中心-边缘”地理文化的认识，既有“华夷之辨”的理念，又有“五服”距离感的遗存，而残存的朝贡体系意识仍在起着作用。

随着列强的扩张，英印、沙俄、德国与日本等国侵入中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使得国人在国土沦丧的危局中，痛感边政之重要，陆疆保底之紧迫。抗战时民国中枢机关与经济主体不断西迁，究竟最后可以坐实在何处？政、学、军各界不进行边疆研究是不行的。由此，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无论是政界或学界，都将主要视域集中于中国陆疆的西域部分，这是由国家形势变化所决定的。

其时，迁建到四川的大学中，以边疆研究为对象的机构大多数都与李安宅的研究工作有交集。而李安宅殊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边疆性”和“边疆性最终趋于乌有”的命题。以后来学人细分学科法的观察，看似李安宅在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做田野调查，看似他的论文多有藏地宗教文化可以归到藏学的因素，看似他在社会学范畴谈边疆社会工作的范围与内容可归于社会学范畴……等等，对各种说法作仔细分辨后，所谓“边疆性”的命题，绝不是仅用社会学或人类学抑或是宗教学等单一学科知识就能提出来的。当对李氏的学术生涯研究越加深入之后，对其提出的“边疆性”问题就越感到内容丰富。

当时学界之中学贯中西的学者众多，对边疆现象的属性认识众说纷纭，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吴文藻提出的边疆政治属性的观点。由吴文藻、杨成志所倡导的边政学研究，针对国家解决现实问题之需，从中国陆疆的边疆地区实际状况出发，以政治作为抓手，统领历史、社会、民族、经济、文化、宗教，包括军事等很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因而吴文藻特地说明“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sup>2</sup> 杨成志具有互补性地提出了《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更为具体地将边政学内容及方法进行阐释，受到学界与政界的普遍重视，边政学包括教学与培训以及实地调研的诸多实践性活动随之展开。<sup>3</sup> 曾经参加过吴文藻社会调查活动，又与吴氏关系密切的李安宅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从李安宅本人组织华西边疆学派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地理学等方面的实地调研的情况看，均与当时受到边政学以及边政学实践方法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李安宅以及华西边疆学派的成员，在川、康、甘、青四省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包括政教乃至英印军事活动问题等进行调研，似乎难以用民族志来概括，也超出了社会学研究和所谓社会工作的范围，几乎就是边政学所主张的一系列实践方法的翻版。在这之中，最明显的就是李安宅直接参与了“边疆服务运动”<sup>4</sup>，运用所学的知识与实践结合得到的经验，直接向当时的政府部门建言献策，这与吴文藻当时参与到政府部门的治边工作如出一辙。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逐渐扩展，民国时期由官方推动的边疆研究也逐渐式微。<sup>5</sup>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边疆研究

<sup>1</sup> 受朝贡体系传统观点的影响，当时的学者比较通行地将一些地方称之为“苗疆”、“回疆”、“藏边”、“川边”、“滇边”，其视域被“主体民族文化之外的地区皆为边疆”的理论所限，难以与现代边疆理论接轨。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受此影响，在论文中使用这些词汇和观念，也时有相关论坛召开学术会议。

<sup>2</sup>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1期。

<sup>3</sup> 参阅吴楚克：《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sup>4</sup> 邓杰：《李安宅与边疆服务运动》，《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sup>5</sup> 参阅李勇军：《时局与边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



了，国家和时代对边疆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批从事边疆研究的专家学者投入到新的实践之中。

以李安宅为核心的华西边疆学学派的骨干成员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得到贺龙的垂询与赏识，推荐参加了张国华领导下的以王其梅牵头的十八军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并在之后随军进藏。<sup>1</sup> 有资料显示，成立于1950年2月28日的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很快就达到40多人，相继聚拢了很多熟悉康藏地理、人文、经济、宗教、政治包括军事等情况的人才。<sup>2</sup> 从当时撰写的《进军康藏应注意的事项》、《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藏人的风俗和禁忌》、《清廷对西藏用兵的研究》、《进军守则》、《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等资料来看，其用处在于提供给十八军和中共西南局参考，其中不少内容由中共西南局转报中共中央，最终反映在决策中。<sup>3</sup> 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初做好西藏工作的“十大政策”到达成“十七条协议”等历史过程中，<sup>4</sup> 学人很容易感受到其中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相联系的纹络。

可以说，李安宅等华西边疆学派的核心骨干参加到和平解放西藏的队列之中，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和观点，在辅证西藏战略地位、西藏遭帝国主义染指等方面相当的重要，在进军西藏路线抉择、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民族宗教政策研究、建立统一战线策略、军地财政组织建议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上看，难能可贵，功不可没。<sup>5</sup> 华西边疆学派在进军西藏时所做的工作，既体现出边政学学派核心人物早期的主张，也直接体现出华西边疆学派多年研究的宗旨，即学为国用的目的显现在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国家战略上。从这一点看，李安宅的学术活动，包括其学术共同体所做的研究，较之于边政学学派学术共同体成员在新中国之初所形成的影响及效果更为出色——李安宅、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等人服务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在参与完成新中国统一大陆的历史使命之中，也实现了华西边疆学派后期核心成员从事边疆研究的初衷。而这一历史之中的一个活动片段，一个李安宅人生学术活动达于高峰之际的作为，<sup>6</sup> 似乎隐喻着李安宅自己所提出的“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即边疆性逐渐消失于乌有”的蕴涵。

### 三、近现代中国边疆性与现代性问题的解构

在李安宅那本著名的边疆社会工作的著作中，其给出了人们理解边疆性的观察点，即社会工作是边疆最主要的工作，而边疆性的问题就体现在社会工作之中，若使“边疆性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是由于“如医药、工程师、畜牧师、工业化学家之类的工作，这些工作，只有其各行的技术问题，再不必兼为边疆而有的适应技术。”<sup>7</sup> 到这里，研究者才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李氏其实是将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引入到了边疆性问题之中。其所谓使得“边疆性逐渐消失”的工作，要依赖现代性的介入才能实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对镜像问题的互照，即边疆性是在没有或缺少现代性条件下的产物，若没有现代性的介入也就不会有边疆性的消失。事实上，从

<sup>1</sup> 参阅霞飞：《贺龙与西藏和平解放》，《党史博采(纪实)》2008年第7期。

<sup>2</sup> 参阅赵慎应：《张国华将军在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

<sup>3</sup>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统一战线的100个由来》“十七条协议的由来”，华文出版社2010年。

<sup>4</sup> 参阅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第六章，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

<sup>5</sup> 黄可：《和平解放西藏重大事件实录》37页“为解放西藏而特设的机构——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学苑出版社2013年。

<sup>6</sup> 李安宅在1950年初发表了《新时代中的边疆》一文，综合其之前的研究，提出了体现其学术集大成的一些观点。参阅陈波《李安宅与华西派人类学》第六章。

<sup>7</sup>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第8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20 世纪中叶到今天，中国处理边疆问题的一个底蕴却是由世界现代性的介入而铺垫的。

一般地说，现代性所蕴含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其观念所导致持续进步的社会体验，而这种社会体验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藩篱，在全世界拓展开来成为新的世界体系，成为了各国不可逆转的一种时代观念与行动。先进生产力内在地追求文明昌盛与外在地用科技改造世界两相结合，便成了人们合目的的追求与行动。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由此推进了 15 世纪之后民族国家的实践。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Westphalian system）<sup>1</sup>形成之后相继建立的民族国家中，民主平等的核心价值理念、国家统一的政治观念、自由和法治的社会观念，形成了驱动社会组织机制运行的主观动力。当然，这些现代性也推动了早期强盛国家的海外扩张，包括用战争的形式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带到了全世界。<sup>2</sup>可以说，现代性因素尤其是现代性所蕴含的富强、科学、民主、平等、法治、文明进步等新风席卷全球，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就是一股世界潮流，中国近代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告诫国人强调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于现代性所具有的持续发展的特质，各个民族国家在不同阶段，凡是追求文明昌盛与以科技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甚至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式推动社会进程的活动，都是在世界体系上现代性的体现，至今也是如此。人们所谓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体现的是现代性在一个区域社会中的扩展和普及；换言之，从本质上看，现代性越是在一个区域得到全面推进，实现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越能得以体现。

如果人们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李安宅的边疆性问题，那么就有一个从现代性到现代化的推进问题。20 世纪初到中叶的中国“边疆”，学界一般所指的是国家疆域陆疆西部边缘的地方，也包括与内地生产方式、经济活动形态差异较大的省级边缘地带，两者在研究与实践上的活动，也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的。从这个问题的相关性视角看，从那个时代起，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疆性与现代性两者是并存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被谓之以“边”的寓意，虽然不完全同等于国家边疆，但由于多数地方具有同质同构的形态，例如西藏与相邻四省的藏地，在社会的经济、文化、民俗、生产方式等方面就是同质同构的，在不作行政区划辨析以及不进行地理细分的情况下，当时的学者理所当然的都视之为“边疆”，这是在学术研究之中亲缘性问题可以互换对象的一种现象，以至于学者们熟视无睹，遂成常例。

从理论与实践上看，没有或者是缺乏现代性的边疆，一定不会有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边疆即成为落后乃至贫穷地区的代名词，亦是边地的代名词。由此而论，李安宅所说的“边疆性的消失”，其中就有着对中国进入现代性时代的认可和赞成，在《边疆社会工作》这本书中，李氏十分明确点出的“医药、工程、畜牧、工业化学”这些职业者到边疆工作，方能够使得边疆性逐渐消失，直言说明了由于不同于以往的现代科技介入到“边疆”之后，将逐渐改变那里的生产方式，进而使得中国这个较晚才实现了从封建王朝转型到民族国家的东方大国，在边疆地区通过先进生产力的引进，树立起民主平等的核心价值理念、国家统一的政治观念、自由和法治的社会观念，包括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并自觉地形成驱动当地社会组织机制运行的动力；最终，使得中国少

<sup>1</sup>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建立之后，各个民族国家的内容与形式在主权意识下更加牢固，为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一个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均势并不巩固，但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在这个体系之后的西方，现代性（modernity）开始产生并以加速度发展并推及到全球。

<sup>2</sup> 参阅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第 5-7 页，商务印书馆 2005 年。周宪在此书中汇集了关于现代性的范畴、结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审美现代性及日常生活批判等一系列论文。本文对现代性的理解，很接近周宪阐述的现代性认识。





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不再谓之“边”，亦即不再是远离繁华中心的荒凉边缘部分。而这一切，都是现代性之于边疆性所能起到作用的集中体现。只不过，李安宅先生未直接说明这是现代性的问题，也未预见到在少数民族地区构建现代生产方式与体系的困难和长期性。多年之后，其参加进藏部队到了西藏之后，所做的工作范围有限，以及再往后回到内地，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导致学术研究中断乃至结束，人们再未见到李安宅后续的研究成果。

20 世纪中叶中国西部的边疆地区，较之于沿海和中部省份几乎没有什么现代性，零星的现代小学、公路、厂矿……大多数与各地统治者的喜好有关，少量的是民国政府有意为之，试图以现代文明的器物教化民众，整备军需，打通关隘以通边陲等，而并非当地社会普遍的文明进步所致。即使是有少量的开明人士，兴办了现代文化、经济事业之后，引来攻讦不计其数而举步维艰，致使当事人身心俱疲到后来废毁所兴办的事业。长期在川、甘、青藏地做社会学（人类学）工作的李安宅，对这种状况是非常清楚的。其所说的“边疆性”，就直接越过了一般地理上的框定，没有仅仅划定在国家疆域的边界（边境线）之内的地方，而是指向了那些与内地有差异的经济文化区域的属性上——李氏所从事的边疆社会工作（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其底蕴其实在于现代性在边疆地区的推进，从而在生产方式的改造之后使得边疆性消失。如其所点明的那样，那些现代化事业只有落地到中国西部边疆并得到大力发展，边疆性才会逐步归于乌有。

到此，隐喻在李安宅命题之中的两个因素，对世界潮流体验上的现代性与对藏区现实感受的边疆性，有了一个可做分析的架构，即现代性在其书中是隐性的一个前提，而边疆性则成为社会学的显性问题，这两者被分析解构出来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在时代背景下考量后的答案，亦即所谓边疆性需要放到现代性命题之下，才能彰显出来。然而，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现代性所蕴含的因素之中，富强、科技、民主、法治、平等、文明进步等，如何使边疆性消弭，既是一个有待深入的理论问题，<sup>1</sup> 更是一个长久的实践问题。

随着形势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学界所研究的边疆，早已不同于 20 世纪人们视域之中的边疆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国家疆域的地理边疆仅仅只是边疆形态的一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边疆拓展到底土、空疆、外空疆、网络、金融等方面，实体的与虚拟的边疆在国家博弈之中遍及各个领域，边疆的特征已经难以被框定在单要素的认定之中，所谓边疆特征是与时俱进的，需要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边疆现象做研究之后，才有可能接近理性认可的特质表征，其中必然要有对边疆属性问题的认识。尽管学界至今对边疆的属性问题一直没有厘清，但早期的边疆性问题还在随着现代性在延伸，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越过洲际和国境而产生的世界性的实践和体验，边疆性依然有着面对现代性的现实意义。当然，这种意义必须在突破传统的地理边疆观的窠臼之后，才能显现出来，20 世纪如此，21 世纪依然如此。

## 余论

李安宅进藏之后，基本上与曾经从事的边疆社会研究脱离了，虽然担任昌都、拉萨小学筹建主要负责工作，开办军地干部藏语文学习班等，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在做服务边疆的教育工作，可是已经不能说是学术研究了。后来，李氏还认为自己在西藏举办军地干部藏语文学习班期间，各个部门派出调查组所做的西藏宗教之调查，与他自己早先所做的调查“相一致”（此为李安宅原话），<sup>2</sup> 可见其作为当事者，不可避免的有“迷”的时候，看不到其后去的调查组将西藏宗教的

<sup>1</sup> 黄万庭：《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中国社会工作》2012 年 16 期。

<sup>2</sup>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1988 年第 1 期。此文系李安宅对自己在 20 世纪 40 年代撰写的论著汉文稿丢失仅存英文稿之后，再将英文稿翻译为汉文书稿的节录，仅发了书稿的“出版前言”等三个部分。



调查置于社会整体制度的背景下，把西藏宗教的高级僧人集团列入三大领主的行列，并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分析其政治和经济行为——这样一种较之于西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有着明显区别的调查方法以及成果，与李安宅自己早期所做的研究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相一致”，但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是李氏的认识盲区。

李安宅在十八军政策研究室，与同仁们通过对早期藏地的系统研究提供的资料以及对策性的建议，确实对进军西藏、经营西藏有很大作用。然而，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公布之后，一个蕴含在共和国进程之中的问题便浮现出来——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所建立的国家，需要在社会属性的研究上揭示出社会的制度性问题——而对这一点李安宅多年之后也似乎没有真搞明白——新中国需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成果，业已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前提，在对边疆进行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也是如此。

早在 1951 年 5 月，张国华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期间就见到郭沫若，提到了需要对西藏做系统深入调研的事情。“中央研究批准后，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负责统筹规划，科学院和国家人事部门负责这件事的具体安排。”<sup>1</sup>当年成立的进藏科学考察队中以自然科考为主，也设有社会历史组（后改为社会科学组），组长由林耀华担任。林氏在后来所著的《民族学通论》一书中，有一部分对西藏当时的社会制度、人们的阶级成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都有论述。这显然与李安宅早期从美国带回的理论与方法来做的藏族社会研究，是大相径庭的。

至 1956 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赴藏；其后，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及其他单位又增派人员充实了调查组力量，从 1958 年至 1962 年深入到西藏很多地区的基层做调研；在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下，调查组人员结合编写《藏族简史》、《藏族简志》等，与西藏地方研究人员一起全面展开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陆续刊印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系列的油印本与铅印资料，后又多次结集出版。<sup>2</sup>在前后 10 来年多次的调查之中，多个小组搜集到了大量过去从未有过的以藏族为主的社会历史资料，其中有很多的资料来自于在庄园和牧场以及寺庙的实地调查，集结成册后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这些材料的汇集，在更高更广的学术层面上支撑了执政党和国家的有关理论以及方针政策。可以说，这样大规模的以新的理论为指导的实地调研，对于研判西藏乃至青、甘、川、滇藏地的历史沿革、社会制度等，与新中国所确立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以及宗教政策相吻合，而与李氏早期的研究已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李安宅早期的边疆社会工作留给后人的财富是相当丰厚的，即使是对其在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点见解上的挖掘，我们也能发现历经时光刻蚀而依然发光的东西来，其中关于边疆性问题的探讨，就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命题。李安宅所提出的边疆性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建构中国特色边疆学的兴起，应该进入到边疆学原理研究的范围之内，这本是个不言而喻的命题，但在目前的边疆理论的研究之中，尚未引起必要的注意和给予应有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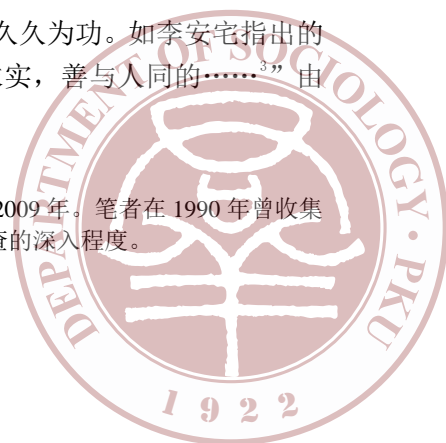
## 结语

包括边疆社会工作在内的所有边疆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须久久为功。如李安宅指出的那样，是“一点一滴，经常创新的；一步一步，不求近效的；避名求实，善与人同的……”<sup>3</sup>由

<sup>1</sup> 多杰才旦：《我与西藏的不解之缘》，《中国藏学》2005 年第 3 期。

<sup>2</sup> 参阅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笔者在 1990 年曾收集到西藏 1959 年民主改革前后社会调查的一些油印与铅印本，可以看出当时调查的深入程度。

<sup>3</sup>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第 18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2 年。



此,李安宅提出调研与具体工作都应该有长远的计划,且不应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其提出了“可有两条道路,一条即自中央单元化起来,一条乃由工作所在地单元化起来<sup>1</sup>”的意见,较早就给出做好边疆社会工作,逐步消除边疆性的操作路径。有学者特地指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不是书本上的说教,而是可以付诸实施的具体方式方法,这也是他对社会工作之本质的理解的最好注脚。<sup>2</sup>”其实,通观李安宅的边疆研究,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的范畴,所做的学术贡献也不止于一般文献介绍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乃至美学的范围。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李安宅应该是中国边疆学跨学科研究早期的奠基者之一,其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做了跨学科的边疆研究,尽管还不是很自觉的或者说是从实用角度所进行的,但毕竟展示了多学科研究的益处,且取得了不菲的收获。

李安宅的边疆学术研究,包括边疆性问题的阐述,是具有开创性的,而这种开创性又以其学术活动向着学术界扩展,交响出了学术研究的主旋律以及和声,与当时吴文藻的边政学派、顾颉刚的边疆史地学派、陈寅恪的边疆学术实用研究、方国瑜的西南边疆研究等相呼应,共同为国家解决边疆问题而设谋。尤其是在新中国统一大陆的历史关键时刻,李安宅投入到时代的大潮之中,参加到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队伍之中,以专家学者的身份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种立于松涧而放眼峻岭的见识,潺湲溪流汇于大江波涛的志向,值得后来的学人纪念和学习。研究李安宅的边疆理念和学术思想,总结其学术生涯之得失,对于边疆理论的深度探索大有裨益,至少可以用于培植今天边疆学研究中多学科跨通的学养,并在学界蓄养出做研究工作要有大格局的视域以及襟怀。

####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 1、冀文正:《北京专家在西藏》,《西藏科技》1995年第3期。
- 2、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3、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 4、马大正、刘遯:《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 5、厉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
- 6、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1期。
- 7、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
- 8、汪洪亮:《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民族学刊》2013年第6期。
- 9、孙喆:《江山多娇:抗战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
- 10、公彦云:《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学术期刊研究》,《西南大学》2014年。
- 11、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12、姜义华:《现代性:中国重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 13、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
- 14、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
- 15、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sup>1</sup>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第5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

<sup>2</sup> 朱慧敏、彭秀良:《李安宅与边疆社会工作研究》,《中国社会导刊》2016年19期。





## 【论 文】

# “纯洁”还是“混合”

——近代汉人学者的“民族史”写作\*

常 宝

**摘要：**族群文化西方与世界各地“民族史”的著述及其发展几乎与“科学史学”的兴起同步进行。“民族史”写作与科学史学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近代中国汉人学者的“民族史”，其实质既是民族主义“史学”，也是科学主义“史学”。大部分学者有强烈的汉人民族主义和革命情绪，主张改写汉人“民族史”，而一部分学者始终坚持各民族“种族”与“地域”上的“混合”与“统一”的观点，成为后来学者所继承的遗产，对近代与当代国家和社会建构产生了影响。

18 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使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连成一片的世界格局趋于分散，世界不再是大家庭，民族和民族主义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写作，中断了“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者“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延续，以西方近代史学为楷模的民族史写作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民族主义史学”。被誉为“科学史学鼻祖”的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其学术生涯也以“民族史”、“国家史”的写作为主。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家在改造传统史学的时候，也主要尝试写作“民族史”，但其目的则往往是激发民族感情、抵御西方的侵略。于是，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代史学的主要模式，虽然后来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本文，将以中国近代汉人学者“民族史”写作为例，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各种表现形式，揭示史学近代化的多样性，主要以近代中国汉人学者所撰写的几部“民族史”为对象，简略分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过程与衰竭倾向。

### 一、科学的发展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新兴资本主义集团通过与皇室、教派的联手，获得了政治与宗教的独立权，并开始进行海外扩张。这些种种变革的结果，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了建造民族-国家，培养民族主义的感情势在必行，从而历史写作改变其形式和内容。在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便已有史学家写作了《意大利史》，以后各国的史学家都有所效仿，出现了类似的“民族史”和“国家史”。

随着宗教改革、科学思想的发展和世俗主义的盛行，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古代、中世纪史学中所记载的各种神话传说和宗教奇迹，希求从确切的史实出发，重建真实的过去。自文艺复兴以降，欧洲人文主义的学者已经在版本考订、鉴别文献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于是，历史写作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在 18 世纪以后，开始出现重要的变化，史学写作逐渐形成了“科学化”倾向。

史学风格的转变和对历史真实的追求看似客观、公正和中立，但其背后充满了实际需求和功利性目标，即为了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构建。于是，在史学写作上，“科学化”和“民族化”同时出现。被人们称作为“科学史学的鼻祖”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就一方面否定他的德国同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黑格尔的描绘歪曲了历史事实，历史并没有那样固定的演化规律。

\*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人人类学评论》第 19 期(2011 年 6 月)，第 58-71 页。





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在历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坚信民族-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置于重要地位，则在他的史学研究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与当时的欧洲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息息相关。从17世纪直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的兴亡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主题。包括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在内的史学家发起的欧洲所谓“古学运动”（antiquarian movement），其目的是重建过去，展现自身民族的辉煌历史，提升民族意识，而且那些历史学家在民族-国家建构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前所未有的。他们都认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张“个人应服从于国家”。

## 二、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民族史

欧洲的科学发展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直接影响和促使了东亚帝国的近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出现，也决定了史学的转变和“民族史”内容。民族主义传入东亚和中国以后，迅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用来抵御欧美强权侵略的理论武器。与此同时，来自东亚各国与中国传统的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也有清晰的表现。

近代中国汉人思想家、知识分子精英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治国”“治民”观念和理论建构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和提倡，特别是在历史的撰写与史学理论上逐步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讨论主题。其中，汉民族是“纯洁”的群体还是“混合体”的讨论始终贯穿了近代史学体系，成为“民族史”的争论焦点和核心议题。此争论和议题自然涉及到“科学”“启蒙”与“民族主义”的范畴，可用“科学”与“民族主义”概念和因素加以解释。

“民族史”的写作过程，是历史上的学者和精英们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立场的集中体现。在20世纪20、30年代，在汉人精英、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随之，在“民族史”的写作方面也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意识和民族观的表现。

### （一）梁启超与《中国史叙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中国历史研究法》

20世纪初的中国，有关汉民族起源的论说喧闹一时，尤其主张中国民族“外来之说”煽惑极盛。1906年梁启超（1873-1929）写就《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在其中就提出了自己的独特思考和观念，他认为：“我中国民族，即所谓炎黄遗胄者，其果为中国原始之住民，抑由他方移植而来，若由移植，其最初祖国在何地，此事至今未有定论。”<sup>1</sup> 并列出了其所关注和欲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即：“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若果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则其单位之分子，今尚有遗迹可考见乎，其最重要之族为何为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二问题。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为第二次，乃至第三四次之混合否乎，若有之，则最重要者何族何族，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三问题。民族混合，必由迁徙交通，中国若是初有少数民族，则其迁徙交通之道，有可考见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四问题。迁徙交通之外，更有他力以助长其混合者否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五问题。迁徙之迹，限于域内乎，抑及于域外乎，若及于域外，其所及者何地，其结果之影响若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六问题。……中华民族，号称同化力最大，顾何以外来之族多同化于我，而我各省各府各州县，反不能为完全之自力同化，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七问题。自今以往，我族更无求以进于完全同化乎，抑犹有之乎，若有之，其道何由，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八问题。”<sup>2</sup>

梁启超1921年在南开大学演讲，之后将此讲稿命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该演讲中，梁启超对“史之意义”进行解释：“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赅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

<sup>1</sup>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sup>2</sup>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则曰中国史。”<sup>1</sup> 这里，梁启超的民族史学观念呈现得淋漓尽致。

梁启超从当时的国家利益和中国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实出发，运用世界视角，在著作的多处阐释了他对民族问题的一系列见解和观点，可能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运用科学观点和进化理论方法研究和讨论中国民族史学的思想者，对 20 世纪民族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的核心观念是，主张以汉族为主的多元融合的民族史学研究视角。梁启超早在 1901 年在他《中国史叙论》中已谈到中国境内民族来源的多元性，强调汉族也不是出于一祖。1906 年，梁启超明确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sup>2</sup> 他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再次指出“我中华民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sup>3</sup> 他通过大量考察，并经过反复论证，对汉族发源地和其他各民族迁徙、流动和演变规律得到了比较完整的结论，认为：“臆推我国各地区原始时代所有民族之大概”：“大抵诸族之起，非沿大江，则缘大湖。黄河流域，则有我中华民族焉，洞庭湖、鄱阳湖及扬子江中游灌域，则有苗族焉，岷江灌域，则有蜀族焉，嘉陵江及扬子江上游灌域，则有巴氏族焉，淮水灌域，则有徐淮族焉，两江灌域，则有百越族焉，滇池及洱海灌域，则有百濮族焉。”<sup>4</sup> 这些结论基本符合之后历史学、考古学所发现的结果。这种观点打破了历史以来汉族所拥有的优越感，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的“汉族一元论”。

在历史上各民族交流过程中，梁启超特别注重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的现象，将汉族同化诸异族所用的程序归纳为：“1. 诸异族以国际上平等交际的形成，与我族相接触而同化；2. 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使其逐渐同化；3. 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4. 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入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5. 以经济上之动机，我族自由播殖于他族之地；6. 他族征服我族，经若干岁月之后，遂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7. 他族之一个人或一部族，以归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国国籍；8. 缘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国。”<sup>5</sup> 梁启超依然坚持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分析法，认为汉族在历史上发生的多族融合过程中始终占据了核心地位。

## （二）傅斯年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傅斯年（1896-1950）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他“民族史”的代表作。其中他认为殷人发源地在渤海周围，“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相土是商代甚早之先王，海外即指渤海。正当傅斯年撰写此书时，日寇在东北发动“9.18”事变，占领东北地区，并宣扬东北地区并非中国领土。傅斯年为驳斥日本人谬论，特地撰写《东北史纲》，并用大量资料证明“殷代祖先起自东北方向”。在他以后的史论和文章中多次阐述中华民族多源一体理论，论证先秦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经过殷周两代政治文化发展，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秦汉以后成为一体的具有高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著，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在以后研究中继续发展中华民族多源一体的理念。据他自己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该书“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sup>6</sup> 由

<sup>1</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sup>2</sup> 梁启超著，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680页。

<sup>3</sup> 梁启超著，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3213页。

<sup>4</sup>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sup>5</sup>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32页。

<sup>6</sup> 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



于日帝侵华，加之“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傅斯年未完成《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写作，但从该书中清楚地感受到傅氏民族观的大致轮廓及厌恶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

《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均是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重要章节。《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sup>1</sup>在《夷夏东西说》的“总结上文”部分中他又说：“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结局。”<sup>2</sup>至此，对中国历史上国家性质的演变和不同势力对抗过程做了一些定论。另外，《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一部分。

傅斯年的观念和对中国历史分期方法与其他史学家截然不同。傅氏认为：“中国史不仅必须是民族主体的历史，而且这个民族主体必须是汉族。正是汉族的命运应该决定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解。”“中国历史的断层不是秦朝的中央集权，而是发生在公元4世纪魏晋结束之后的西晋时中原为胡人所占据。傅氏断言在此之前的两千多年汉人一直保持了其纯洁性。”<sup>3</sup>他认为魏晋以后则是胡汉在血缘及文化上的混合。“傅氏把这一时期称为‘第二中国’。他暗示‘第三中国’兴起于民国，但不很明确。……这里历史发展的范畴本身似乎与民族主体的建构联系在一起。”<sup>4</sup>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史”写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三）顾颉刚与《古史辨》

顾颉刚（1893-1980）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最卓越的汉族历史学家。他揭示正统儒家学说的叙事掩盖了其他叙事，挑战汉民族“纯洁”性，并高度评价异族与异文化的重要作用。顾颉刚提出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sup>5</sup>的著名论断，并因不遗余力地剖析民族主义的历史神话而遭到国民党的非难。他试图通过打破汉族纯洁性神话的方式来改造中国历史叙述结构本身，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正好是社会变迁、混乱、竞争激烈的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一统和儒教的制度化恰恰造成了压抑和衰败，正是由于外来者和边缘居民周期性地给予中华文化以活力，才使得中华民族延续下来。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点和视角，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顾颉刚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六万多字的“自序”中从时势、个性、境遇等方面畅言自己所以有“古史层累地造成”这一见解的原因以及“依据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传说中的古史”<sup>6</sup>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后人的关注。他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他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

顾颉刚先生又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访谈，如1934年的绥远考察和1937-1938

<sup>1</sup> 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

<sup>2</sup> 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sup>3</sup>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sup>4</sup>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sup>5</sup>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自序”，第29页。

<sup>6</sup>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自序”，第36页。





年的西北教育调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诸民族在种族、地域关系上的复杂性和统一性,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到西北去》、《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西北回民应有之觉悟及其责任》、《中华民族是一个》、《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及“续”)》、《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等诸多文章,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过程,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

#### (四) 王桐龄与《中国民族史》

王桐龄(1878—1953)的《中国民族史》最初版本由文化学社在1934年出版。据马戎教授介绍:“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全书原计划共分为上下两编(‘内延史’和‘外延史’),分别叙述‘中国民族对内融合事迹’和‘中国民族对外发展事迹’。”<sup>1</sup> 20世纪90年代,上海书店编印《民国丛书》,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与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同编入该丛书的第一编第80卷(历史、地理类)影印出版。2010年4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编辑《民国学术丛刊·历史编》,将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作为丛刊之一,重新出版。

王桐龄先生的这本《中国民族史》是以历史分期为章节,在各历史时期分析各民族的交往历史进程。换言之,这本书以历史分期来划分各编(章),在各编(章)中分别叙述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演变过程。因此,可认为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是一部中国民族交往史。

王桐龄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以汉族为主体,把汉族发展的全部历史划分为一个胚胎期、四次大蜕变和四次蜕变之间的三个修养期。王桐龄在文字叙述中并没有大量引用古代文献关于各民族的文字记载,而是把文献中有关民族融合的资料(通婚、改名、改姓、吸收外族做官、外族归化等)汇集成表格,这些表格几乎占据了所有篇幅,同时作者通过零零星星的文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王桐龄先生193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影印本共680页,2010年重印版《中国民族史》共582页,除序论和结论外,全书分为八章,分别论述了划分为八个阶段的中国历史民族交往过程,即(1)汉族胚胎时代(太古至唐虞三代);(2)汉族第一次蜕化时代(春秋战国);(3)汉族第一次修养时代(秦汉);(4)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5)汉族第二次修养时代(隋唐);(6)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及宋元);(7)汉族第三次修养时代(明);(8)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清)。各章节引经据典,详细地介绍了历史上各民族、部落融入中原以及边疆各个部落被中原文化同化(汉化)的过程。全书八章的主要内容,都紧紧围绕着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这个主体和主线。本书最大的特点,即是在每章的“附录”部分以表格的形式详尽地开列了从历史典籍中查找出来的有关各民族“接触”事件、跨境移民、“归化部落”、以及各朝代皇族中的族际通婚(后妃族属、公主宗女下嫁)、朝臣族属、朝臣更改异族姓名等等的情况,书中共有这样的表格约161个,另外还有反映各朝代皇族的族属世系表68个。每个表格中每个具体人物,都注明其姓、名、家世、族属、官爵、资料出处等。

王桐龄先生提出: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边远民族与汉族较易融合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血统接近,……故同化较易”,二是“诸族起源地,除去北狄、西戎以外,皆在河流近旁。……地势偏南,气候较为温暖,雨量较为丰盈,交通较为便利,故容易进化成为农业国。秦汉以后,此一方之人民,遂同汉族混合,不再分立矣。”<sup>2</sup>

这里讲述的“同化”或“融合”的基础条件为两个,即“血缘”与“文化”。在各族相互同化、融合的过程中,他们之间血缘之远近程度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王桐龄的研究得出结论:“东夷一支与汉族血统接近,吴越、荆楚二支血统,界乎汉苗两族之间,蜀族血统界乎汉藏二族之间,

<sup>1</sup> 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sup>2</sup> 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6页。





庸族血统界乎汉苗藏三族之间，故同化较易。群蛮为苗族直系血统，闽与瓯越、南越三支为苗族旁支血统，巴族血统界乎苗藏二族之间，西戎为藏族，北狄为满蒙二族之混血族，故同化较难”<sup>1</sup>。

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经济类型和文化特点也是“同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汉族的农耕技术和农业社会组织在当时东亚大陆上确实最为发达的。在这个前提下，从事粗放农业、畜牧业、狩猎采集业的其他民族不断推崇和学习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接受了汉文化，从而逐渐融入汉族。

王桐龄先生这本书最终核心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实际上已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他写道：“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sup>2</sup> 当王桐龄在中国民族集合体这一层次上进行分析时，他提出“中国人民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sup>3</sup> 这一观点。

王桐龄先生不仅将历史以来的汉人、汉族视作为各民族“混合体”，也将周边的部落和少数民族确定为“混合体”，认为甚至在远古时代，这些部落、民族就是不同民族的“混合体”，如汉族在其“胚胎期”是四支部落（炎帝、黄帝、周、秦）的血缘混合体，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獯鬻”则是通古斯和蒙古两支血统混合后变成的一种“新民族”<sup>4</sup>。

#### （五）林惠祥与《中国民族史》

林惠祥（1901-1958）先生言道：“欲求明了中国各民族过去之史实不能不先理清其种族之分类。”<sup>5</sup> 他采用“双重分类法”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进行分类叙述，并阐明“现代之民族谓之族，历史上为之系”，根据此种分类方法把中国古代的民族分为16个系和黑白两人种。林惠祥先生注重在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相互融合的观点，并将历史民族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定义为“历史上一民族常不止蜕嬗为现代一民族，而现代一民族亦常不止为历史上一民族之后裔。”<sup>6</sup> 在林惠祥看来，“秦併六国统一于华夏，……自上古以来之异族凡在域内者除南蛮及西南夷外大都同化于华夏系。”<sup>7</sup> 从林惠祥的研究中看到，中国古代“系”与现代“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演变、同化过程的基本脉络（见下图：中国民族系统表）。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是他史学观与民族观的大集成。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的结果，华夏系与现代民族都有关联，东夷系还与满洲族有关系。在东夷蜕变同化于华夏系后，华夏系虽然成为汉族的主干，但是汉族并非是华夏系一系后裔，而是由众多族系融合而成的。

林惠祥不仅从各民族内部特质演变、转移的角度分析民族发展问题，也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与研究民族之间的交往。他指出：“中国民族史为叙述中国各民族古今沿革之历史，详言之即各族而讨论其种族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别，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并及各族相互间之接触等问题。”<sup>8</sup> 至此，他对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理解就是各民族间相互接触和混合。

从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所阐述的古代民族关系和交往模式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并可找到相应的例子：

<sup>1</sup> 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6页。

<sup>2</sup> 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序论，第1页。

<sup>3</sup> 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结论，第576页。

<sup>4</sup> 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5页。

<sup>5</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页。

<sup>6</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8页。

<sup>7</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7页。

<sup>8</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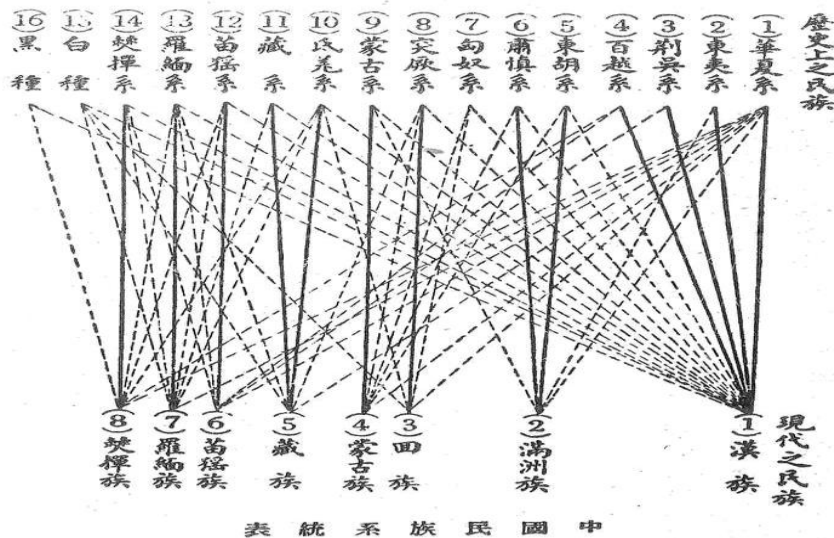


图 中国民族系统表

资料来源：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9页。

(1) 战争。“高车至后魏时与蠕蠕即柔然为敌，亦常侵魏，魏太祖亲征大破之，徙其众于漠南。其后高车各部酋长陆续降魏，且就魏食，其他诸部仍散处北方然不能为患也。”<sup>1</sup>

(2) 和亲。“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sup>2</sup>

(3) 改姓。“唐亡后土蕃亦分裂不复振。西夏构兵会利用土蕃中较强之部夹攻之。初封其国西凉府首领潘罗支为防御史，后西凉为西夏所取，复用宗哥城首领角厮 为节度使进封郡王。角厮孙陇拶玄孙木征皆内附，入朝，赐姓为赵，并改汉名。”<sup>3</sup>

(4) 封赐。女国“唐初曾数次遣使来，唐乃封其女王之夫为王。其后服属土蕃。唐德宗时求内附入居中国西境。”<sup>4</sup>

(5) 通贡。“南州近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虎皮麝脐来贡。”<sup>5</sup>

(6) 同化。“唐以后长江以北不复有蛮，同化与南徙必皆有之。”<sup>6</sup>

(7) 抚绥。“宋代对待南蛮多用抚绥之法，然亦略有反抗。”<sup>7</sup>

### 三、“民族史”的衰竭

#### (一)“悖论”的显现

19世纪的欧洲史学家（以兰克史学为代表），一方面强调史料批判和客观态度的重要，以此来批驳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实践，但在另一方面，又与国家政权一起，以历史写作为手段，为营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努力。因此，他们的实践就造成一种悖论的现象：“他们通过提倡科学治史戳穿了不少古代神话，但同时他们用科学方法写成的著作。其实又构造了民族-国家的神话。

<sup>1</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5页。

<sup>2</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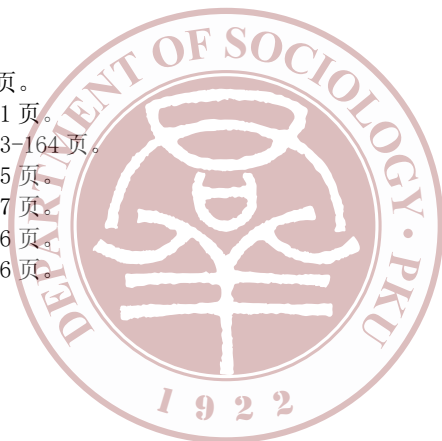
<sup>3</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63-164页。

<sup>4</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55页。

<sup>5</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97页。

<sup>6</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96页。

<sup>7</sup> 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96页。



这一现象，在世界民族史学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但具体情形又各个不同。”<sup>1</sup>

若“地域”在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另一个重要角色便是“种族”。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中，种族主义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如中国汉族人的反满情绪。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种族主义扮演了一个双重的角色，既可用于来抵御“他者”，又可用于与“他者”团结。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便立即提倡“五族共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开始出现批评民族史的声音，非洲、亚洲等地区也有相似的现象发生。以突破传统的历史思维而言，“民族史”的写作只是其中之一。反省“民族史”在近代史学中的地位和得失、作用和影响，可窥见其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降很多学者形成了一个共识：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生造出来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民族-国家又有实际的意义，对近代的教育学，特别是史学，至今尚有深远的影响。与教科书的写作一样，“民族史”写作不仅要完成博大精神的传播和教育，也要创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

由此可见，近代之后，历史研究潮流，尤其是“民族史”的写作，在实际操作中始终处于尴尬的夹缝中，西方人勾勒出的民族-国家的“想像”和“蓝图”，在欧洲以外的许多地区的国家建构过程中曾面临不少障碍，如一直以“天下”为世界观的中国人较难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这也许是所有研究亚洲地区近代化的学者的共识——为自己的国家撰写一部完整、精美、独一无二的、单一民族的“民族史”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的盛行

民族和阶级是不太容易分清楚的概念。在实践中，阶级意识往往涵括民族的向度，在阶级的统辖里，民族和“民族主义”是阶级意识的强化剂。马克思主义十分注重阶级意识和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之时的“无产阶级自决论”充分说明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继承性，“李大钊就是以阶级的语言来想像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sup>2</sup>因此，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主张的“民族主义”不同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家提倡的“中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兴盛后，在1949年以后，更是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史料学派”相比之下，逐渐衰竭，只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台湾，仍然有其影响力。

## （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覆盖

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分析清末时期“民族主义”时，强调了跨国联盟的必要性。卡尔由此得出结论，当时革命派“民族主义”已突破了国家范畴。如清末在日本成立的“亚洲和亲会”，是建立一个超国家联盟的尝试。因此，“卡尔从晚清政治思想当中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的民族主义’。”<sup>3</sup>与清末革命派一样，民国末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引进的共产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拥有了超“国家”的共产主义高度和世界视角，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次汇合，成为一种国际主义。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民族史”写作又有了新的视角，民族不再是“民族史”的基本单位，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扩展并覆盖了原有民族的视野，使得“民族史”改变了方向。

## （四）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涌现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权力整合的主题，与国家振兴和独立的目标、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

<sup>1</sup> 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家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sup>2</sup> Meisner, 1967: 188;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sup>3</sup> 慕唯仁，“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弱国联盟”，《读书》，2003年，第12期。





尤其遭受外国势力的入侵时，爱国主义情绪油然而生。在菲利克斯·格罗斯看来，“爱国主义是一种自然情感，是个人对其故土、传统、历史、朋友——尤其是对童年朋友——和亲属的眷恋，往往也是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赞赏，一句话，是对民族的一般文化的眷恋。”<sup>1</sup>“爱国主义是最原初、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概念系来自主权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是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sup>2</sup>“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关系最显而易见的表达便是世界各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sup>3</sup>

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一般人所认同的基础，因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乃是地缘或血缘等较小的群体。到了20世纪，中国国家及民族主义的形成，则与列强的入侵和冲突密切的关系。这与先前的中国认同的文化建构很不一致。”<sup>4</sup>“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革命性”结合，使得“民族主义”走到了极点。随着抗日战争的来临，使得“史料学派”逐渐丧失其吸引力。年轻的学生不再认为埋头于故纸堆中，甚至出现了躁动不安的革命情绪。胡适的学生，史学界新秀吴晗（1909-1969）的转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是“史观学派”抬头的主要标志。之后的“民族史”主要以“革命史”“战争史”为主题，一时放弃了传统“种族”与“地域”的讨论。

## 结 语

“民族史”的写作发端于欧洲，其后的世界各地民族史的著述都有其共同的特点，即其发展与“科学史学”的兴起几乎同步进行。如何分析、考察“民族史”写作与科学史学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

近代中国汉人学者的“民族史”，其实质都是民族主义“史学”，也是科学主义“史学”，只不过在“史观学派”或“史料学派”等学派分类和形式上有些不同而已。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已经是“史观学派”的一个先声。从那时的中国史学发展情形来看，胡适、顾颉刚强调史料的批判，经傅斯年的发展，导致“史料学派”的出现。有趣的是，梁启超到了20世纪20年代，转而支持“史料学派”，写作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像胡适一样，梁启超希图从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发掘科学的因素。他们两人都认为就科学方法而言，中国传统学问，如清代的考据学，并不落后于西方。从1920至1930年代，由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史料学派”流行一时，那时发表的史学论著，大都是专题研究，以考据为重点。但是，就思想意识而言，“史料学派”的学者也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革命情绪。他们侧重史料的发现和批判，目的是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也即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写中国的历史，这与欧美的“民族史”写作，如出一辙。

在核心内容上，中国近代绝大多数汉人“民族史”家，注重中国多民族自古以来“种族”与“地域”上的“混合”与“统一”，影响了费孝通等又一代学者的思想体系，“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sup>5</sup>的观念被继承下来，这无论对近代国家与社会建构，还是对当代国家政权巩固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sup>1</sup>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sup>2</sup>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4页。

<sup>3</sup>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sup>4</sup> [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sup>5</sup>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 参考书目:

- [1]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2]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4]梁启超著,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5]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6]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  
[7]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8]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下](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  
[9]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0]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1]慕唯仁,“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弱国联盟”,《读书》,2003年,第12期。  
[12][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14][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译,《转变的中国》,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 【论 文】

# 家庭的民族特征与藏族大学生的高中学业成就<sup>1</sup>

陈彬莉、陈 进<sup>2</sup>

**摘要:** 学业成就对少数民族学生参与祖国现代化事业与拓展个人发展机会有着重要影响,也是21世纪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关注重点之一。关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学业成就差异通常存在“文化差异”与“结构性因素”两种解释路径,本研究对西藏4所本科院校1288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来自于藏族家庭的孩子的高考成绩明显低于来自汉族家庭的孩子;相比社会阶层、城乡等结构性因素,家庭的民族身份与藏族大学生高考分数之间有显著关联。家庭民族身份反映了学生家庭的民族(相关的)文化特征,通过显性(比如,汉藏语言能力)和隐性(比如,对现代学校教育的认知)等多种路径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因此今后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和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关注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形势下,通过加强藏族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来提高他们数理化学科的成绩,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和拓展他们的就业空间。

**关键词:** 民族文化特征; 学业成就;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我国西部地

<sup>1</sup> 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第34-41页。

<sup>2</sup> 陈彬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陈进,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区的人才和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质和量的双重变化,不仅在不断升级扩容,大规模人才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西部地区原来的就业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以我国藏族地区为例,一方面有部分藏族人口向东部城镇迁移,如2010年普查时生活在西藏自治区地方之外的藏族人口有54万,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8.6%<sup>1</sup>,这些藏族人口在藏区之外找到了就业空间;另一方面,2010年有28.6万非藏族人口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占西藏总人口的9.5%。<sup>2</sup>族群人口跨省区流动的规模在新疆、内蒙古等地更为可观。如此规模的各族人口跨越省区边境的劳动力迁移,正在逐渐改变我国传统的民族居住格局和语言学习模式。在西部城镇的社区、企业与服务行业中,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正在逐步成为最主要的工具性语言,因此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的汉语能力以及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双语能力和学业成就将直接关系他们今后能否进入高等院校深造和人生发展机会。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这些学生毕业后就业的选择范围就越宽,相应的发展机会及拓展的空间也就越大。研究表明,对于每个少数民族成员来说,自身教育程度的提升与知识结构的扩展有助于缩小其与主体民族成员在社会职业结构中地位与实际收入的差距<sup>3</sup>。从更宏观的民族平等的角度考虑,一个民族的成员中拥有高学历者在全体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越大,这个民族在主流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就越大,当各民族在劳动力职业分层结构中趋于一致时,民族平等才能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sup>4</sup>。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历史上的发展差距、传统经济模式的差异、基础设施及学校教育条件的差异、教学使用语言与教材质量的差异等),我国有些少数民族的学生与主体民族学生相比在学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sup>5</sup>。

为了补偿少数民族学生在接受现代教育过程中由于语言差异、教材质量和本地学校教育质量<sup>6</sup>所造成的就业竞争劣势,逐步缩小他们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差距,增强我国少数民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从建国初到现在,我国政府逐步建构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和各种倾斜性政策来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就。

在这些综合性、体系化的政策实施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学生目前的学业发展状况如何?各类课程的学习成绩是否仍与汉族学生存在明显的差异?学业成就的差异是否依旧与其民族背景相关?这是本文所关心的核心问题。高考分数是个体基础教育阶段学习质量和成就的集中体现<sup>7</sup>,也是目前高等学校录取的最核心依据。以母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高考中使用少数民族文字考卷的少数民族考生(“民考民”),特别是“理科”考生,在学习时使用的教材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考试成绩。而那些在中小学期间转用汉语为教学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使用汉语考卷的少数民族学生(“民考汉”),他们并转用非母语的汉文课本学习各门课程必然面临很大难度,付出的辛苦和努力使可想而知的。正是由于考虑到以上因素,我国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高考录取时对这些少数民族学生采用了程度不同的优惠政策。

<sup>1</sup> 马戎,2014,《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第121页。

<sup>2</sup>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和国家民委经济司编,2014,《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上),北京:民族出版社,第5-6页。

<sup>3</sup> Campos, B.C., Ren, Y. et al.,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Vol (41): 253-267.

<sup>4</sup> 马戎:《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sup>5</sup> 教学使用语言与教材质量对于学生在自然学科(数理化等)的学习成绩密切相关。母语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满族、回族学生的学业成绩与汉族学生大致相近,虽用母语教学但教材质量较高的朝鲜族学生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汉族学生(马戎,2013,《民族社会学》北大出版社(第二次印刷),第663页。

<sup>6</sup> 由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藏区)的现代学校教育起步较晚,编写的数理化专业教材的质量有待提高,任课教师的学历和教学经验有待较强,这些地区中小学数理化课程的教学质量明显不如内地学校。

<sup>7</sup> 我国高考的科目对于“文科”考生为:中文、英文、数学(各150分)、历史、地理、政治(各100分);“理科”考生为:中文、英文、数学(各150分)、物理、化学、生物(各100分)。



本文主题并不是聚焦高考成绩的具体分科差异，而是探讨少数民族学生的整体高考成绩及其与汉族学生的差异，并努力探讨这一差距背后的影响因素。

关于少数民族学生学业劣势的解释，在社会学界主要存在“文化差异”与“结构性因素”两种主要路径。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侧重“文化差异”的视角。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关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欧美人类学研究就关注到少数民族裔的学业发展上的劣势，提出文化剥夺、文化冲突和文化中断理论等。这些理论分别从黑人和白人所处社区文化环境的差异、少数民族学生在家庭和社区中所习得的语言、文化与正规学校教育既定系统之间的差别、不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价值冲突等多个方面来解释少数民族学生低学业成就的原因。<sup>1</sup>之后，教育人类学家约翰·奥格布又提出了文化生态理论，试图从少数民族的历史经验、社会地位、生存策略、以及族群关系等多重角度来解释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少数民族的群体成员如何看待既有的文化差异以及其对于教育的态度。<sup>2</sup>西方与中国人类学家对我国单个民族或者将具有共同地域特征和发展水平的若干民族的学生学业成绩的个案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特点（状况）。<sup>3</sup>

然而，在现有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研究的大样本量化分析（研究）中，“文化差异”因素的作用却不明显，研究者通常更聚焦于结构性因素（例如社会阶层、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等）影响的分析。大量研究指出，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教育获得之中的差异可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地域、城乡和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因为少数民族居住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西南、西北）及农村的比例更高，家庭社会经济水平更低，这些“非民族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其教育获得。例如韩怡梅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教育获得之中的差异可以部分归因于地理位置和贫困。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以后，民族间的入学差距大大缩小，仅仅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就解释了民族入学率差异中的三分之一，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地理特征两个因素共同解释了 50% 以上的民族差异。除了大的地理区域划分以外，城乡差异也是区域差异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农村孩子的教育获得远低于城市儿童。对于聚居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大部分人居住在农村地区，故其与汉族相比的教育获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城乡差异。洪岩璧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所产生的影响。两项基于中国西部省区的研究均发现，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地理特征这两个因素至少可以解释这些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学业成就或升学差异的 50%。在这类研究中，与民族特点相关的“文化变量”解释力则相对有限。比如在洪岩璧的研究中，民族身份变量在“基础教育阶段入学机会的获得”中并不显著，家庭常用语言的影响虽然显著，但其解释力远低于上述结构性因素。然而，许多现存的这类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将不同的少数民族汇总进行处理，即把 55 个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忽略各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事实上，在中国的 55 个少数民族中，既有教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朝鲜族和满族，又有远低于全国水平的多个民族。不同民族间的语言、价值观、教育经验以及对现代学校教育所采取的主观态度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研究者有必要对中国国内的不同民族进

<sup>1</sup> 滕星、杨红：《西方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山区拉祜族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祖力亚提·司马义：《少数民族教育与教育的成功——新疆大学双语教育体系的个案研究》，转引自马戎、郭志刚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84-128页。

<sup>2</sup> 袁同凯：《教育人类学简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8-102页；巴战龙：《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研究的根本论题和基本视角》，《全球教育展望》2018年第1期。

<sup>3</sup> 郝瑞（Steven Harrell）：2000，《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滕星、杨红：《西方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山区拉祜族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袁同凯：《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罗吉华：《教育人类学视野下傣族和尚生低学业成就归因分析——以西双版纳州勐达镇中学为个案》，《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行分类研究。

本研究以西藏 4 所本科院校 1288 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关注的是一个文化同质性相对较高的群体，即单一的藏族学生。通过比较藏族和汉族大学生的高考分数差异，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两个群体的学业成就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藏汉之间的文化差异？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家庭所属社会阶层的影响？在我国少数民族当中，藏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受教育程度整体相对较低。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藏族文盲率为 30.5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0%；6 岁以上人口获大学本科及专科教育比例为 5.38%，全国平均水平为 9.19%<sup>1</sup>。本研究以这两个民族为单位，将藏族和汉族学生的高考分数进行对比，分析藏族和汉族学生的学业成就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相关分析将有利于丰富和细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图景，帮助我们更好了解低于全国平均教育水平的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进而为今后致力于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

## 二、研究方法

###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 2017 年西藏大学学生处《大学生生涯实践与就业创业指导》课题获得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西藏自治区 2017 届毕业生。该课题在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农牧学院和藏医学院这 4 所大学一共发放 1800 份问卷，具体抽样的方式为整群抽样，第一步先在每所学校抽取若干个系或学院，第二步在这些院系中再整群抽取若干个毕业班。实际回收 1435 份问卷，回收率为 79.7%。本研究主要使用了该问卷中的本人情况和家庭情况两个部分的相关数据。在剔除结果变量和解释变量缺失的样本 (N=147) 后，最终的分析样本包括 1288 名西藏在校大学生。

### 2. 变量、模型选择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西藏大学生的民族身份与其高考分数之间的关联。模型中的因变量为学生原始的高考分数，分文、理科考生分别进行回归，自变量分别为学生家庭的民族身份、学生的汉语能力，控制变量为学生性别、家庭所在地、父亲受教育年限和职业<sup>2</sup>。

除了极个别的族际通婚家庭外，学生本人的民族身份与其父母民族身份高度相关，因此本研究选用“家庭民族身份”这一变量来综合呈现学生及家庭的民族特点，分为两大类：（1）父母双方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如门巴族），（2）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汉族。父母双方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意味着家庭生活中日常使用语言为藏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家庭生活的组织和运行具有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在父母至少一方不是藏族的情况下，意味着家庭日常生活使用语言至少部分为汉语，那么该家庭的子女在家庭生活中应该是受到汉语环境的影响，在家庭生活中汉族的文化元素有可能多一些。基于文化差异理论，本研究提出假设 1：与家庭民族特征为藏族的学生相比，汉族家庭的学生高考分数相对较高。

与主流民族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有独立语言和文字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从小生活在民族语言体系之中，进入以汉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教育后，其汉语水平有可能低于汉族，不利于其在学校的学习，进而有可能影响其高考分数。即学生的汉语水平有可能是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大学里将汉语水平作为少数民族学生分班的重要依据，各大学通常将汉语水平较高的藏族学生分在汉藏混合班，而将汉语水平较低的藏族学生分在纯藏族班。因此，本研究通过学生在大学期间所处班级的学生民族构成来间接测量该学生的汉语能力，具体

<sup>1</sup> 马戎，2013，《民族社会学》北大出版社（第二次印刷），第 663 页。

<sup>2</sup> 由于父母的教育程度与父母的职业之间呈高度相关，而且父亲的教育和职业能够代表一个家庭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本文选用父亲受教育年限和父亲的职业来呈现家庭的社会地位。



分为两组：(1) 藏族学生为主（汉族学生少于 5 人）班级，(2) 汉藏混合班。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提出假设 2：与汉语水平较低的藏族学生相比，汉语水平高的藏族学生高考分数越高。

### 三、 研究发现与分析

#### 1. 样本基本情况

调查样本中的女性学生比例略高于男性，为 53.3%。少数民族学生占 55.4%，汉族学生为 43.6%（参见表 1）。在少数民族学生中，藏族学生占比为 99%，其他为门巴或珞巴族学生。父母双方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如门巴族）者在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55.1%，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汉族者所占比例为 44.9%。从中可以看出，西藏大学生中有一半以上出生于少数民族家庭，另一半来自汉藏通婚家庭或汉族家庭。

来自西藏自治区内和自治区外的考生在样本中各占约二分之一，其中区内农牧区学生比例为 31.2%，区内城镇学生比例为 19.7%。来自西藏自治区外的学生当中，农村学生比例为 36.7%，区外城镇学生比例为 12.4%。被调查学生父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9 年。在学生父亲的职业结构中，52.9% 为农牧业人员；服务业和制造业普通员工的比例为 14.1%；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为 15.8%。有 69.0% 的学生在大学中处于汉藏混合班级，而 31.0% 的学生处于以藏族学生为主的班级。

表 1、样本中学生个体及家庭特征描述 (N=1288)

变量名称	特征分组	频数(%)或均值(标准差)	变量名称	特征分组	频数(%)或均值(标准差)
学生性别	男	601 (46.7%)	父亲职业	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204 (15.8%)
	女	687 (53.3%)		服务业或制造业普通员工	182 (14.1%)
学生本人族群身份	藏族或其他民族	727 (56.4%)		个体户	139 (10.8%)
	汉族	561 (43.6%)		农牧业	681 (52.9%)
父母族群	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	710 (55.1%)		其他	82 (6.4%)
	父母一方为少数民族	578 (44.9%)	父亲受教育年数(年)		7.9 (4.1)
大学所在班级族群构成	汉族和藏族混班	889 (69.0%)	家庭所在地	区内农牧区	402 (31.2%)
	以藏族为主(汉族学生少于 5 人)	399 (31.0%)		区内城镇	254 (19.7%)
				区外农村	472 (36.7%)
				区外城镇	160 (12.4%)

调查样本中依据大学生主要个人与家庭特征分组的高考分数均值见表 2。男生成绩高于女生，出生在父母有汉族成员家庭的学生高考成绩高于藏族家庭学生，这一结果在预料之中。但是父亲是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的学生平均成绩反而比不上父母为服务业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学生，其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说明。从家庭所在地而言，城镇学生成绩高于农牧区，区外学生高于区内学生，这反映出区内学校的教学质量仍需要进一步提高。汉藏混合编班学生的高考成绩高于藏族班学生，这反映出来的实际仍是中小学阶段藏文教材和课程教学质量等方面问题。

在所调查样本的 1288 名学生中，文科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378.7 分，理科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361.8 分（表 2）。数据的标准差较大，即表示分数的分布离散程度较高。藏族文科大学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312.8 分，而汉族文科大学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454.4 分，二者相差 141.6 分；藏族理科



大学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293.2 分，而汉族理科大学生的高考平均分为 457.2 分，二者相差 164 分（见表 2）。理科成绩的族别差异远远大于文科成绩，这说明藏族学生在数理化等理科科目的学习成绩特别需要关注。

表 2、西藏大学生高考分数平均值（N=1288）

变量名	特征分组	高考分数均值(标准差)	
		文科	理科
	所有学生	378.7 (102.0)	361.8 (104.7)
性别	男	390.4 (99.2)	380.6 (103.7)
	女	370.2 (103.3)	343.5 (102.6)
民族	藏族或其他民族	312.8 (64.2)	293.2 (66.2)
	汉族	454.4 (83.1)	457.2 (66.9)
家庭民族特征	父母一方或双方为汉族	454.6 (83.2)	456.9 (68.4)
	父母均为藏族	308.6 (58.1)	289.9 (60.9)
父亲职业	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403.7 (98.8)	391.0 (103.3)
	服务业或制造业普通员工	419.6 (102.5)	404.5 (100.1)
	个体户	442.1 (95.6)	430.4 (90.8)
	农牧业	338.1 (88.6)	325.9 (94.6)
	其他	389.5 (91.9)	413.1 (95.7)
家庭所在地	区内农牧区	306.7 (57.6)	289.8 (65.0)
	区内城镇	356.0 (88.2)	348.9 (94.4)
	区外农村	415.9 (102.8)	402.8 (103.8)
	区外城镇	460.5 (83.3)	459.5 (68.9)
大学班级 民族构成	以藏族为主的班级	301.6 (49.4)	289.6 (69.6)
	汉、藏混合编班	416.9 (99.7)	392.3 (102.1)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

## 2.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高考分数的“净影响”不大。

在文科学生中，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均与子女的高考分数无直接关系（模型 3）；在理科学生中，父亲的教育程度与子女的高考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41），而与父亲职业则无直接关联（模型 6，参见表 2）。这说明与其他研究者将多个少数民族汇总取样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在西藏大学生这一群体中，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与其学业成就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阶层通过家庭的民族特征来对高考分数产生影响，在本研究中，当在多元回归分析单独加入阶层变量时，阶层因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当在阶层变量基础上加入家庭民族特征这一变量时，阶层变量基本不再显著。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基础教育事业的大力扶持与多项优惠政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由于学生家庭贫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 1951 年以来，西藏的现代教育历经了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过程。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中央政府全力扶持和地方政府积极努力的结果。从 1985 年开始实行“三包”（包吃、包穿、包住）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间历经多次调整，覆盖面和资助金额不断扩大。政府的经济扶持大大推动了西藏基础教育的普及进程。2007 年，西藏自治区开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2 年实行十五年免费教育。截止 2011 年，西藏自治区的小学入学率达到 99.4%，初中入学率达到 98.5%，高中入学率达 63.4%<sup>1</sup>。与此同时，为了利用内地的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少数民族人才，1985 年开始在内地 19 省市开办三所西藏中学和十六个西藏初中班，全部从西藏招收藏族等当地世居

<sup>1</sup> 韩晓悟：《西藏教育十年变化》，《西藏教育》，2012 年第 12 期。





少数民族学生入校学习,实行“四包”(即包吃、包穿、包住、包学习费用)。<sup>1</sup> 尽管中央政府对于西藏教育的(大力)扶持政策覆盖所有群体,但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影响更大,有可能补偿了家庭贫困给学生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由此在数据分析的结果中体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高考分数的影响不显著。

### 3. 西藏自治区内高考成绩城乡差距不明显,区内外理科生高考分数差异显著。

在调查样本中,有一半左右被调查的大学生来自西藏自治区之外。分析表明,来自西藏自治区内部的学生中,城乡背景差异对学生的高考分数影响不显著,但西藏自治区内的学生高考分数显著低于区外学生。与区内农牧区生源比,区外农牧区生源的高考分数要高 16.7 分,区外城镇生源高 21.7 分(见模型 3 和模型 6)。

西藏自治区内藏族学生成绩中的城乡差异不显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 50 年代之前西藏无论城乡都没有建立现代学校,解放后在建立现代学校教育方面城乡几乎同时起步,二是中央政府在西藏基础教育方面的大力扶持对于城镇学校和乡村学校基本同步,因此城乡学生的学习成绩差距不大。而区内外的差异源于西藏本地学校的师资条件、语言环境、教学质量与其他 4 省(四川、甘肃、青海、云南)藏区学校的教学质量存在一定差距,这一差距是在民国时期形成的,民国时期的青海省、甘肃省、西康省、云南省政府曾一度努力发展藏区学校教育,因此 4 省藏区的藏族学生在报考西藏自治区各大学时,在考分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当我们以区外的汉族学生作为参照对象时会发现,无论是西藏自治区内的藏族还是汉族学生,在将来的竞争中均有可能处于劣势地位,而藏族学生的处境更为不利。今后西藏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如想改变这一基本态势,必须下大力气全面提高西藏各级学校的师资队伍和教学水平。

### 4. 学生及其家庭的民族特征是西藏大学生高考分数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在被调查学生中,父母双方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考生其高考分数比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面为汉族者低 160 分,即使在文科学生中,其差距仍为 151.4 分。在控制阶层、区域等因素后,在文科学生中,父母双方均为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考生其高考分数比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面为汉族者低 128.7 分,在理科考生中,上述两个群体相差 134.79 分。可见这一变量影响力度之大。从模型 1 到模型 3 以及模型 4 到模型 6 的调整 R 方的微小变化,可以得知家庭的民族特征是西藏大学生高考分数差异的最主要解释变量。

与以往的量化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教育成就差异的结构解释不同,本研究发现,社会阶层(表现在父亲职业方面)、城乡差异等结构性因素不能完全解释藏族和汉族学生高考成绩之间的差异,民族之间的“文化特征差异”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解释机制。在对于文化差异的具体比较中,既包括显性的文化差异,比如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学习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又包括了隐性的差异,比如一个少数民族基于自身的群体经验对现代学校教育所采取的主观态度和对学校学业成绩的重视程度等。

西藏自治区作为以藏族为主要人口的民族聚居区,父母的民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是因家庭环境所获得的与民族相关的文化特征。本文认为,由于 50 年代之前西藏一直没有建立起现代学校教育,民主改革后建立的学校在师资队伍、数理化教材建设、教学经验等许多方面处在努力追赶的阶段,这无疑对西藏的藏族考生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上的高考成绩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方面的影响客观地表现在汉藏学生高考学业成绩的差距上。

<sup>1</sup> 马戎:《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96 年第 2 期。



表 3、 西藏大学生高考分数多元回归结果 ( N=1288)

		文科 (N=473)			理科 (N=815)		
		模型 1 系数	模型 2 系数	模型 3 系数	模型 4 系数	模型 5 系数	模型 6 系数
家庭民族特征	父母一方或双方为汉族(参照: 父母均为藏族)	146. 0***	128. 71***	114. 19***	166. 95***	143. 89***	134. 79***
性别	男(参照: 女)		19. 60**	18. 35**		1. 41	2. 06
父亲教育年限			1. 35	1. 39		1. 97**	1. 74*
父亲职业	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1	1		1	1
	服务业或制造业普通员工		6. 48	5. 61		2. 29	3. 53
	个体户		3. 88	3. 25		11. 05	12. 15
	农牧业		-10. 90	-8. 27		-5. 75	-4. 87
	其他		-29. 23	-15. 29		-0. 28	1. 26
家庭所在地	区内农牧区		1	1		1	1
	区内城镇		-12. 48	-15. 29		2. 46	3. 74
	区外农村		18. 39	15. 71		17. 56**	16. 69**
	区外城镇		20. 76	18. 73		23. 18*	21. 72*
大学班级民族构成	以藏族为主的班级(参照: 汉族和藏族混班)			-28. 57***			-25. 41***
截距项		454. 6***	441. 39***	443. 28***	456. 87***	419. 91***	423. 13***
Adj R-squared		0. 52	0. 53	0. 54	0. 62	0. 63	0. 64

注: \* p<0.05; \*\* p<0.01; \*\*\* p<0.001。

西方的文化差异理论对于少数民族学业成就低于主流族群的一个解释是: 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在教育过程中得不到充分重视, 使得携带这一文化的群体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他们在学习主流群体语言和现代学校教育科目知识时必然付出额外的努力, 这无疑影响了考试成绩。对于藏族学生来说, 有研究发现,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 藏文是四大科目之一, 但随着年级的增加, 藏文的课时数在减少。而汉语则随着年级的增加, 成为学校教育系统主要课程的通用语言。此外, 在其他科目的教材内容之中, 整体社会的生活与文化内容逐渐增多, 而有关藏族的生产和生活内容不断减少<sup>1</sup>。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现代教育系统与藏族传统生活与文化内容之间的疏离, 使得藏族学生的学习过程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语言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显性指标。本研究发现, 藏族学生的汉语言能力与高考分数之间有着显著关联。在加入反映学生汉语水平的“大学班级民族构成”变量后, 在模型 2 和模型 5 的整体解释力分别较模型 1 和模型 4 提升了 1 个百分点, 而家庭民族身份变量的影响系数有少许下降。汉语水平对学生高考成绩影响十分显著, 在文科生中, 以藏族为主班级的学生高考分数比汉藏混班的学生低 28.6 分, 理科考生的上述两个群体相差 27.7 分。

在这里, 我们可以借鉴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来进一步分析。伯恩斯坦指出, 不同社会阶

<sup>1</sup> 朱志勇:《西藏牧区小学教育调查—那曲地区达萨乡小学个案分析》, 转引自马戎、郭志刚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年, 第 277-333 页。



层在家庭中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劳工阶层通常多使用“限制型符码”，中产阶级多使用“精致型符码”，而学校教育主要传递以“精致型符码”为主的知识，由此，中产阶级子弟更容易适应学校环境，进而更有可能在教育竞争中获胜。尽管伯恩斯坦侧重的是阶级分析，说明劳动民众日常用语（如中国的民间口语）与知识阶层用语（如文言文）在词汇、语法和习惯上存在差异，相关差异影响了来自不同阶层学生的学习，并不直接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异，但是该理论指出了家庭语言与学校语言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一点非常重要，可用来理解本研究发现藏族学生的学业发展劣势。对于家庭语言为非汉语的藏族学生来说，以汉语为主要媒介和以汉语书面写作能力为基准的学校教育环境很大程度上使其在教育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对于西藏近些年来推行双语教育的相关研究发现，基础教育阶段汉语教学质量不高，其中汉语师资的缺乏是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sup>1</sup>。与此同时，从目前西藏的双语教育实践来看，学校教育层级越高，汉语水平对于学科知识的吸收和消化就越重要（尤其是数理化）。西藏 95% 的小学目前主要采用藏语授课，从一年级开始开设一门汉语课。在初中阶段，约有 13% 的藏族学生仍为藏语授课模式，即除汉语文课以外，其余课程藏语授课。而在高中阶段，只有 5.7% 的藏族学生属于藏语授课模式，大多数学校采用的是汉语授课模式<sup>2</sup>。不难看出，对高中阶段的学习内容来说，学生的汉语水平直接影响到其对具体学科知识（如数理化）的吸收。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藏族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中的劣势，进而影响了他们的高考成绩。

除了语言因素之外，隐性的文化差异，比如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于教育意义赋予的不同，有可能也是藏族学生学业成绩较低的另一个解释路径。汉族传统上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群体，长达 1300 年的科举制度形塑了每一个家庭“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并激励着家庭为子女的教育大量投入。相比而言，藏族则没有如此强大的教育传统。藏族传统上“学在寺院”，有“舍寺院之外无学校，舍宗教外无教育”的说法，寺院教育几乎是唯一的教育途径<sup>3</sup>，而且是少数人的特权。寺院教育以宗教经典为核心内容。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现代教育在西藏的发展以及藏族对现代教育的认同。一直到 1950 年代初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拉萨建立了第一所现代小学，1959 年后现代学校教育才在西藏地区得以大范围推广。

近些年在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投入和动员下，虽然许多藏族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重视学校教育，但他们对现代教育的认同主要来源于其工具性作用，比如接受学校教育后能够提高生活质量、改变现有的生活状况，考上大学后可以当政府公务员等。但在教学过程中，藏族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学校教育的所传递的知识在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以现代化城市生活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系统（特别是教材内容）与农牧民日常生活严重脱节，许多由汉文课本直接译成藏文的历史、地理、政治等教材与藏区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严重脱节，统一的标准化的义务教育模式忽略了藏区文化传统的本土知识经验。这种知识的脱节使得藏族学生在学业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容易落空，反过来又有可能抑制家长支持和投入子女教育的意愿<sup>4</sup>。此外，随着西藏大学生就业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需要面向市场来自主择业，大学生就业难也可能进一步抑制藏族父母及其子女对于教育价值的认同，进而影响其就学行为<sup>5</sup>。

此外，汉藏学生高考成绩的差异有可能还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优惠政策的“非预

<sup>1</sup> 马戎，《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中国藏学》2011 年第 2 期。

<sup>2</sup> 马戎，《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中国藏学》2011 年第 2 期。

<sup>3</sup> 吴德刚：《西藏教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年，第 69 页。

<sup>4</sup> 朱志勇：《西藏牧区‘三包’政策下的基础教育反思：达萨乡中心小学个案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 年第 4 期；Postiglione G, Jiao B. & Gyatso S. “Household perspectives on school attendance in rural Tibet”, *Education Review*, 2006, Vol .58 (3): 317-337.

<sup>5</sup> 朱志勇：《西藏牧区‘三包’政策下的基础教育反思：达萨乡中心小学个案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 年第 4 期。





期后果”有关。以 2017 年重点本科分数线为例，文史类汉族学生的分数线为 441 分，相应少数民族为 353 分，二者相差 88 分；理工类汉族学生重点本科分数线为 426 分，相应少数民族为 296 分，二者相差 130 分<sup>1</sup>。然而，这一优惠政策有可能会给藏族学生带来负向激励，使得其他后续在校中小学生认为只要投入较少的学习时间，就可能通过高考加分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比如，一项基于蒙古族学校的人类学研究发现蒙古族学生中存在这一负向激励机制。国家一系列降分录取政策使得蒙古族学生在中考和高考中升学相对较为容易。然而，学业成绩不佳高度影响了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就业状况差。高考加分政策在社会上形成了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的负面“刻板印象”，对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带来普遍的负面影响，这对那些成绩优秀、高考种不需要加分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也是十分不公平的。升学容易而就业差，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蒙古族学生在汉语教学学校的学习动力，强化其对于本族文化和语言的认同，他们往往选择消极对待学业，甚至用一些轻微的越轨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消极反抗，这又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在校表现和学业成就。<sup>2</sup>当然，藏族学生中是否存在或在什么程度上存在类似机制，需要开展进一步调查研究。

#### 四、结论、建议及不足

本研究以西藏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 2017 年对西藏自治区下属 4 所大学在校应届毕业生问卷调查数据的量化分析，分类别地系统考察了藏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高考分数差距。研究发现，藏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存在显著差异。与现有以多个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与汉族进行对比研究所得到的发现不同，本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和地理区域并不是造成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高考分数差异的最核心因素，学生家庭的民族特征才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家庭民族特征即其与本民族相关的文化特征可能会通过显性和隐性等多种路径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由于许多考试科目内容是现代文科知识，目前这些科目的藏文教材和师资的质量明显不如汉文教材，因此，掌握汉语文的能力是家庭民族特征（及其文化差异）影响学生高考成绩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而基础教育中汉语师资的缺乏影响了藏族学生的汉语学习和汉语能力。

基于以上发现与初步的结论，本研究认为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提升藏族学生的学业成就，第一，大力提升西藏地区基础教育阶段汉语师资的质量，是提升藏族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汉语水平与能力的关键。事实上，从目前的大学生就业状况来看，汉语能力的提升也势在必行。汉语作为一门通用语言，是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通用性人力资本。汉语能力和使用汉语掌握专业知识的能力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和发展的瓶颈<sup>3</sup>。在本研究对西藏大学毕业生的调查中也发现，40.2%的藏族学生认为自身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语言能力。这从一个侧面也进一步证实目前藏族地区汉语教学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第二，在学校教育中增强藏族传统文化的地位也有助于提升藏族学生的基础教育质量。其一，努力提高各科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等）藏文教材的质量和师资培训，在教材中增加与藏区本地社会、经济、文化相关的内容和案例，这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成绩。其二，增强藏族地区学校教育课程的文化适切性，以此来增强藏族学生及家长对于现代教育的认同。

<sup>1</sup>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生高考优惠政策幅度大致相似，2018 年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汉文试卷 467 分，民语试卷 327 分（数学最低分 35 分）；文科一本汉文试卷 500 分，民语试卷 418 分（数学最低分 31 分）  
[http://www.orz520.com/a/education/2018/0630/14621282.html?from=haosou\\_news](http://www.orz520.com/a/education/2018/0630/14621282.html?from=haosou_news)

<sup>2</sup> 马文婷、袁同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低学业成就与学生反学校文化关系研究——以青海省乌兰县蒙古族学校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6 年第 2 期。

<sup>3</sup> 马戎，《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 年第 3 期。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西藏在校四年级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和样本来研究西藏自治区的教育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因为无论是藏族还是汉族大学生，能够进入大学已经属于同龄人中的优秀精英群体。以这一精英群体为样本来研究藏族和汉族同龄群体的学业成就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无法直接反映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各族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第二，本研究仅从语言的角度考察了家庭的民族特征的差异与其学业成就之间的关联。实际上，民族特征是一个比语言更为宽泛的领域，包括显性和隐性等多个方面的文化特征，这是本研究的一个缺憾。第三，对于学生汉语言能力的测量还需进一步精确，具体而言，除了考试成绩外，如何测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就业中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还需要在今后的实地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与改进。第四，由于本次调查问卷的篇幅所限，在我们的问卷中很少问及家庭成员如父母和其他长辈对于子女教育的理念问题，比如父母对子女在教育发展方面的具体期待与投入等等，因此，对民族特征和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路径和机制解释主要借鉴相关文献提供的观点和分析逻辑（的洞见），需要通过今后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完善。另外，如何在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水平的同时持续提高各级学校的母语文课程教学水平，努力培养高水平的双语人才，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同样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关注的重要任务。与少数民族的基础教育、高考表现和毕业后就业状况有关的研究专题很多，这些专题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一个多民族国家当中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融入国家现代化演进的程度，也都是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需要长期加以关注的重大研究专题。

## 【论 文】

### 欧洲文献中的土伯特：以十三至十八世纪为重点<sup>1</sup>

陈 波<sup>2</sup>

**内容提要：**本文以十三至十八世纪欧洲有关土伯特（Tibet）的文献为重点，研究涉及土伯特的主要符号及其所指之间的关系。蒙元时代有三个关于土伯特的直接知识传统，在现代早期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把土伯特归属鞑靼范畴，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学界才开始将土伯特转属知纳（China）；1580年代以后欧洲传教士从实地发回报道，提供有关符号及其所指的新知，包括现在普遍接受的拼写形式Tibet和藏文化中的地理分类系统；深入的当地知识和欧洲认知框架之间的不一致关系导致欧洲东方学中出现二重土伯特观，跟二重知纳观交织，并与之一道成为其表达的内在机制、困境和缩影。

**关键词：**Tibet/土伯特；China/知纳；鞑靼；二重土伯特；二重知纳

十三世纪前期蒙古大军西征，引起欧洲的震动<sup>3</sup>；其后果之一便是若干使者前往东方。他们的见闻有涉及土伯特的地方，成为欧洲最早关于这一区域的知识，其影响长达三四个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尤其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有涉足藏区的，始有关于这一区域的新知识陆续出现于欧洲知识界。这些不同时代关于藏区的知识是如何协调、整合的？它们如何反映东方不同区域

<sup>1</sup> 本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第162-176页。

<sup>2</sup> 作者是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教授。

<sup>3</sup> Braham Norwick, "Locating Tibet--The Maps," in *Studia Tibetica*, ed. Helga Uebach and Jampa L. Panglung. Munich, 1988.



间的关系？本文将侧重考察这两个议题。笔者认为，象征符号和所指的链接功能在欧洲知识界理解、想象和建构土伯特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洲对喜马拉雅区域的了解始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公元一世纪老普林尼记载来自印度和中国（Seres）的商品。托勒密地理学在欧洲现代早期得到复兴，也对认知这一区域产生影响。西历纪元十或十一世纪早期的印度梵文文献中提到 et-Turbet, el-Tubbet, Thobbet 和 Thobbit<sup>1</sup>。十世纪的波斯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中写作 Tubbat 和 Tuput,<sup>2</sup>其他的波斯文形式有 Tibit, Tibbit, Tibbet, Tibat, Tibbat, Tibbut 等，蒙古文则是 Töböt。巴赞等认为类似的名称是中世纪欧洲的旅行者结合波斯形式和蒙古文形式而来的，波斯形式来自阿拉伯文，而后者则是粟特文 Twp‘yt（读如 Topet）的对音，这是所有拼写形式的雏形。<sup>3</sup>

伽丕尼（Friar John of Pian de Carpine）在 1245-1247 年间前往贵由汗宫廷之旅后称之为 Burithabet；鲁布鲁克于 1253-1255 年间东游后的记录中用 Tebet；波斯学者瑞师德丹丁（Rashededdin, 1247-1318）用 Buri Tibet<sup>4</sup>；《马可波罗行纪》的不同版本中用过 Tebet, Thebet<sup>5</sup>, Thebeth<sup>6</sup>, Thebethe<sup>7</sup>；鄂多立克写作 Tibot/Tybot；，曼德维尔的著作中用过 Piboch, Riboch, Ribok, Riboth 和 Rybot 等<sup>8</sup>；Tibet 是 1624 年安夺德所用。普查斯（Samuel Purchas）著中出现过 Tebeth；1633 年伯立（Cristoforo Borri）用 Thibet；1683 年康特利（Giacomo Cantelli）用过 Tobat<sup>9</sup>。1671 年蒙塔努斯（Arnoldus Montanus）在《知纳图志》中同时使用 Tibet、Thebet 和 Tebet<sup>10</sup>；1681 年摩尔（Jonas Moore）用过 Thobrot<sup>11</sup>。

这些符号各不相同，所指也千差万别。据统计，从十三至十五世纪的欧洲文献中，有关土伯特的名称有二十九种之多，1747 年统计时亦有二十种不同的名字。<sup>12</sup>本文研究它们尚未统一为 Tibet，所指也不固定的历史之最初一段<sup>13</sup>。

## 地名翻译的跨文化过程<sup>14</sup>

在方法论上，当代欧洲-西方的藏学界在讨论欧洲有关 Tibet 历史的书写时，大多不会去留意

<sup>1</sup> 巴赞等认为，带-h的拼写法跟 th 一样，没有真正的语音意义，是中世纪用拉丁文拼写外来词的传统，可以不予考虑。见路易·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耿昇译，郑炳林主编《法国藏学精粹》（4），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328 页。

<sup>2</sup> Braham Norwick, "Locating Tibet--The Maps," pp. 305-306.

<sup>3</sup> 路易·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2011 年，第 1328-1329 页。

<sup>4</sup> Rockhill, W. W. trans.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1900. p. 151, fn.

<sup>5</sup> 这个用法容易引起混淆，因为它也指约旦以南的 Edom 王国所属的一个镇。Heylyn, Peter. *Cosmographie in four bookes*. London. 1652. p. 102.

<sup>6</sup> Polo, Marc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A.C. Moule & Paul Pelliot Trans. London, G. Routledge, 1938, p. 271, Fn. 3.

<sup>7</sup> Polo, Marco. *The most noble and famous trauels of Marcus Paulus*. London: H. Bynneman. 1579. p. 77.

<sup>8</sup> Braham Norwick, "Locating Tibet--The Maps," p. 307.

<sup>9</sup> Romolo Gandolfo, "Bhutan and Tibet in European Cartography (1597-1800)".

<http://www.bhutanstudies.org.bt/publicationFiles/ConferenceProceedings/SpiderAndPiglet/9-Spdr&Pglt.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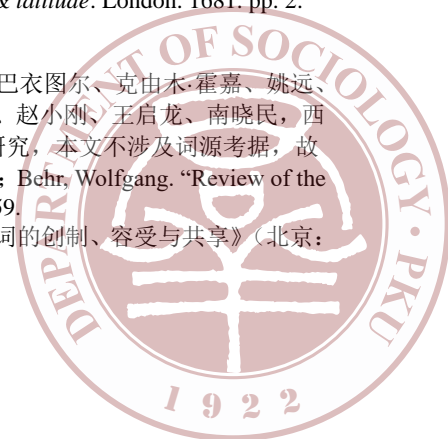
<sup>10</sup> Montanus, Arnoldus. *Atlas Chinensis*. London: Tho. Johnson. 1671. pp. 668, 680.

<sup>11</sup> Moore, Jonas. *A new geography with maps to each country, and tables of longitude & latitude*. London. 1681. pp. 2: 6-7, 9.

<sup>12</sup> Braham Norwick, "Locating Tibet--The Maps," p. 307.

<sup>13</sup> 对“土伯特”（Tibet）这个名称的来历，国内学者如牙含章、江慰庐、安瓦尔·巴衣图尔、克由木·霍嘉、姚远、安才旦、李文实、吕一飞、霍巍、常凤玄、尹伟先、朱文旭、叶拉太、姚大力、赵小刚、王启龙、南晓民，西方学者路易·巴赞、哈密屯和毕鹦等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的角度作过研究，本文不涉及词源考据，故从略。见路易·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2011 年，第 1328-1353 页；Behr, Wolfgang. "Review of 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by Stephan V. Beyer," *Oriens*, Vol. 34 (1994), pp. 558-559.

<sup>14</sup> 就东译西语受文化观念的影响，则沈国威氏《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所述甚详。





身边的汉学；而汉学家们也基本上不关注藏学著作。这种学术壁垒，显然跟西方学界在世界各地建构民族-国家体系的工程有关，并且是这一体系的反映；对本议题的研究来说，影响甚大：沟通它们将产生重大的新知识后果。

西方文献中的 Tibet，指的对象跟藏语中的“博”（བོད Bod）和汉语中的“西藏”有些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如今要说清楚它们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项重大的认识论上的任务。间隔半个世纪之远，任乃强、吴世昌、王贵等都曾先后对此做过类似分析，可见这一议题具有核心的地位。任乃强在 1933 年的《西康图经·境域篇》中提出英文中 Tibet 所指跟中文“西藏”所指并不相同，Tibet 只能译为“土伯特”，不能译为“西藏”；而中文“西藏”一词，只能英译为 Hsi-zang 或 Tsang-po，而不能译为 Tibet。<sup>1</sup>这个思路值得继承和发扬；但由于他没有涉及英文中的知纳（China）及其翻译，问题只解决一半。

1995 年，王贵与喜饶尼玛、唐家卫合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批判西方的西藏独立论倡导者范普拉赫，维护西藏自元以后归属中国的历史和地位时，第一章就讨论这三种语文中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根据英文概念源出中国概念、“名从主人”的原则和中国历史、政治事实，尝试定义英语中的 China 为包含 Tibet 的概念。<sup>2</sup>这一努力拓展了任乃强的思路，值得肯定；但和任氏的进路一样，这一定义需要我们大量的后续学术工作，才能对欧美学界和民间起作用，尤其要求我们深入到欧美学术的脉络之中，找到其肯綮之处，并挖掘西方文献中能支撑这一定义的资源。这样做，可转换西学的话语体系，使之符合事实，也使我们定义它们的关系时在学理和事实层面上都能顺理成章。

1934 年吴世昌批评日本扩张主义者通过操弄“满洲”与“支那”关系来侵略中国的实质，论及西方的族性地理分类系统跟中国体系之间的鸿沟，尤其指出前者对后者的裂解潜力。他的讨论并不限于满洲：他还提醒国人注意西方分类中的 Tibet 跟 China 也有类似的性质，所以力主恢复中国概念体系，可谓卓见<sup>3</sup>。

“西藏”这个明代概念<sup>4</sup>最先是守卫藏地区，今指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康区和安多，用于翻译 Tibet 不合适；而“藏区”这个族性地理概念显然是现代民族识别以后的产物，用于理解历史上的青藏高原亦不适宜。“吐蕃”这个汉文称呼起讫唐，迟至明代都在使用<sup>5</sup>，延续近千年，但因时而屡有变动，亦非西文 Tibet 所指。为避免混淆，本文根据任乃强的意见，将 Tibet 及其变体词音译为“土伯特”<sup>6</sup>，意在松动西方学界假定的它跟藏文、汉文中相关概念之间的一致性。

类似的，在研究欧洲汉学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发明的 China 这个概念所指并非中国：它是 1510 年代欧洲航海者在海旅途中发现的一个地理概念，当源于梵语之称呼中国，但完全没有“中国”的意思，是一个把中国对象化的概念。“中国”作为自称时，它带着一整套天下观和相应的地理分类体系。China 这个称谓完全不含这些内容。相反，欧洲发现它以后，对它进行重新解读，逐渐把它嵌刻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以民族-国家为归宗的地理分类体系中，成为“中国”概念的一个对抗性概念。只有松动 China 和“中国”的严格一致关系，我们才会明白西方学者所理解的 China 在任何时代都只是中国之一部分而已<sup>7</sup>，才有希望在研究中摆脱欧洲观念体系尤其是单一民

<sup>1</sup>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 年第 52-54 页。

<sup>2</sup> 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年第 15-2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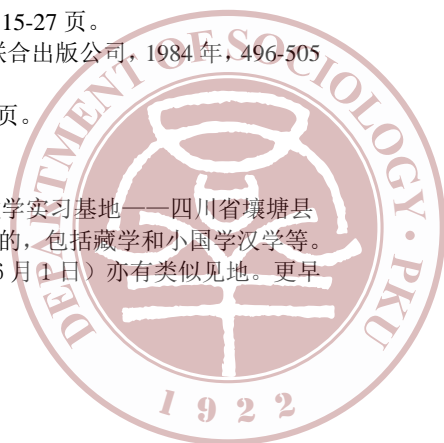
<sup>3</sup> 吴世昌：《地域正名》，收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卷一），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 年，496-505 页；原载 1934 年 10 月 26 日《大公报》之《史地周刊》。

<sup>4</sup> 蔡志纯，“从藏博到西藏地名演变考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 年 1 期 34 页。

<sup>5</sup>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87] 年，24、1053、1186-87 页。

<sup>6</sup>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1933 年第 54 页。

<sup>7</sup> 中国和欧洲-西方“汉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有差异：沈卫荣（“在我们的国学教学实习基地——四川省壤塘县藏哇寺行记”，《中国民族》2013 年 12 期）指出中国的“大国学”是研究诸族的，包括藏学和小国学汉学等。严绍璦（“‘汉学’应正名为‘国际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6 月 1 日）亦有类似见地。更早



族-国家观念对中国体系的束缚，并清晰地认知其意识形态背景及其与中国体系之间的差异。据此，本文根据明末艾儒略的音译，使用“知纳”。<sup>1</sup>这可以避免跟译自印度梵文的“支那”概念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塑造的、带有鄙视意涵的“支那”概念发生关联；其次，这个译语在汉文中相对较为陌生，我们对它尚未附着上情感价值，可以疏离“China”在人们心目中已经造成的等同于“中国”的印象。

此外，并非不重要，有的欧洲作者在当时曾留下记录，但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未能得到公开传播，有的相隔数世纪才得以出版而为人所知。在文献史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与梳理客观的历史过程不同，本文梳理的是地理观念史，因此只从该文献对地理观念产生实际影响的时间点来考虑其意义，而不从其书写时点来考虑其在时间序列中的有无。

### 十三世纪以后欧洲有关藏文化区域的直接知识传统

1693年，法国耶稣会士艾吾瑞尔（Philippe Avril）曾说，西历1256年后的半个世纪当中，若干受遣前往鞑靼大汗那里的方济各僧侣访遍土伯特王国的各个地方。<sup>2</sup>这个说法过于乐观或夸张。1904年卡罗曾追述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以前欧洲有关藏文化区域的知识谱系。根据他的看法，十八世纪以前到过土伯特的有鲁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安夺德（António d' Andrade）和白乃心等人。<sup>3</sup>实际上西历1255年鲁布鲁克（William de Rubruck）从哈刺和林蒙哥汗的宫廷返回欧洲后，在旅行记中提到畏兀儿介于撒拉逊和哈刺和林之间；畏兀儿以东的群山里有唐古特，其外即土伯特（Tebet）；土伯特之外即女真和索伦（Langa & Solanga）<sup>4</sup>。这应是他从今新疆地区前往哈刺和林的旅途上获得的知识。

马可波罗于西历1275至1291年间在中国；其游记说土伯特<sup>5</sup>州属于大汗，跟蛮子大省和其他非常大的省份相邻，离成都只有五日的路程，并于彼地旅行二十日。后世的研究表明，以五日入土伯特州计算，此地当为雅州（今雅安）。<sup>6</sup>此处所说的土伯特州是靠近成都到云南驿路一带的地方。他说土伯特境内有八国，后世学者认为当是土番宣慰州所领八个地区。<sup>7</sup>此外，他谈到上都时，说有两类偶像崇拜者巫师，分别称为“土伯特”（Tebet）和“克什米尔”（Kesimur），又称

---

些时候，桑兵在《国学与汉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的“序言”中已对此议题有过讨论，惜乎没有后续深入的阐述。此外，阎纯德（“异名共体之汉学与中国学”，《国际汉学》2012年2期）认为“汉学”、“中国学”异名共体；计翔翔（“‘汉学’正名”，《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主张用“汉学”来包容“藏学”、“蒙古学”等。对西方汉学进行批判、反思的，包括顾明栋（“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学术月刊》2010年12期；*Sinologism* (London: Routledge, 2013)）、周宁（“汉学或‘汉学主义’”，《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1期）、王海龙（“汉学的悲剧”，《世界汉学》2003年第2期），他如郑永年、李焯然、陈启云、张耀铭等学者都有过深刻的揭示。张西平（“国学与汉学三题”，《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6期）、张耀铭（“中国崛起与‘中国学’的本土化”，《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3期）等呼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立场来书写本土知识体系。

<sup>1</sup> 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2-33页。2017年郝瑞教授在相关讲座中将其译为“柴纳”。

<sup>2</sup> Avril, Philippe. *Travels into divers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693. p.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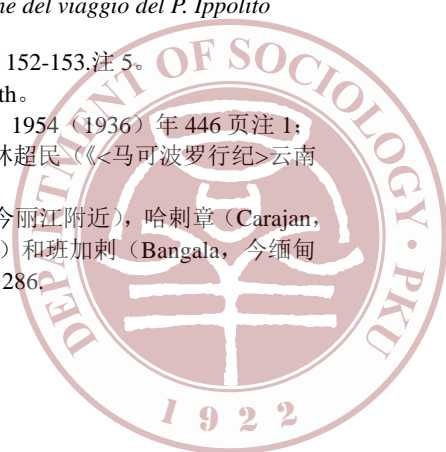
<sup>3</sup> Desideri, Ippolito. *Il Tibet (Geografia, Storia, Religione, Costumi) secondo la relazione del viaggio del P. Ippolito Desideri (1715-1721)*. Carlo Puini ed. Roma. 1904. pp.xv-xl.

<sup>4</sup> 此据柔克义；大概是指满洲和朝鲜之一部。见 Rockhill, 见 William de Rubruck, 152-153.注5。

<sup>5</sup> Polo, Marc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1938, p. 271. Fn. 3. Tebet, 又写作 Thebeth.

<sup>6</sup> 相关讨论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A.J.H. Charignon 注本），商务印书馆，1954（1936）年446页注1；温玉成：《马可波罗游历过“吐蕃州”》，《中国西藏》2013年1期；方国瑜、林超民：《〈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19、55-58页。

<sup>7</sup> 前揭方国瑜、林超民书，1994年55页。他还谈到邻近的省份如建都（Caindu，今丽江附近），哈刺章（Carajan，当即云南）、匝而丹丹（Zardandan，今云南保山一带）、緬（Mien，今蒲甘一带）和班加刺（Bangala，今缅甸南部一带）等。Polo, Marc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1938, pp. 273, 276, 281, 286.



为“法师”(Bacsi),有广大的寺院,大如小城,每寺有两千余人。<sup>1</sup>这里的“土伯特”当指当时的萨迦派僧侣,亦指乌斯藏萨迦派祖庭一带。

之后鄂多立克(Friar Odoric)从海路入华,陆路归国,在元朝期间大约是西历1322年至1328年;返程时,离开契丹(当指北京)50天后,至约翰之国(当即唐古特);尔后到达与印度接壤的土伯特(Tibot/Tybot)大王国,出土伯特后即山老<sup>2</sup>。劳费尔和斯文赫定都认为他只不过是从鄂尔多斯沿着甘肃、蒙古等类似鲁布鲁克所走的路线。“到达称为土伯特的大王国”并不意味着他进入土伯特乃至拉萨;所以劳费尔推测鄂多立克所说的土伯特应当是拉达克<sup>3</sup>。

他们认为上述提及的所有王国或区域都臣服于蒙古大汗。这是对其时蒙元体系的理解。这三家尤其是马可波罗提供的知识奠定此后欧洲想象土伯特的基础,但他们有关土伯特方位的三种说法差异极大,从符号链接性来说需要进行整合,并由此提出新知<sup>4</sup>。

至迟在1599年至1600年的世纪之交,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就曾尝试根据象征符号和所指的链接性将不同的说法整合到一起:他收录鄂多立克游记的英译本,涉及土伯特部分时,指出Tebek就是Thebet;而在其拉丁文原本中,则直接注明此即鲁布鲁克所用的Tebet。在鄂多立克游记谈及天葬习俗时,哈克卢特注明:“这一人群的同样故事亦见鲁布鲁克。”<sup>5</sup>1613年普查斯在述及土伯特(Thebet)葬俗时,亦注明鄂多立克和鲁布鲁克所说的是相同的。在涉及性别风俗、天气咒师、土伯特包括八王国等内容时,则明显采用马可波罗游记的说法<sup>6</sup>。这表明至迟到十七世纪初,欧洲学者已经试图根据符号及其所指的链接功能,将蒙元时代的三家知识整合起来。这种整合是以欧洲的民族-国家标准来进行的。譬如普查斯在1625年版的《朝圣记》的索引部分就整合鲁布鲁克、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提供的知识,把Tebet和Tebeth视为分异但相关联的两个条目:把前者视为属于鞑靼人的一个人群,把后者视为一个行政单位省,但二者条下的内容都涉及土伯特的风俗习惯,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异。这一做法彰显欧洲学界想象土伯特的路数;只不过这一想象不仅与现实不符,与他在注中的逻辑亦不一致:比如他说“土伯特之人”(the people of Tebet)<sup>7</sup>,表明Tebet不是指人群,而是地域。由此可见他试图在符号上作改动,将土伯特放入到欧洲古式民族-国家框架的路子困难重重。<sup>8</sup>

1559年英格兰医生库宁罕(William Cuningham)在《宇宙之镜》的亚洲部分,根据马可波罗的地理概念分类体系,列出契丹(Chatay)和蛮子(Mangi,当为南宋)两个区域;蛮子区域分为九个王国,其中之一即土伯特(Thebet):“该省为大汗即东印度、南印度之主所居;印度所有的国王都受其统辖”。<sup>9</sup>1578年英国数学家博恩氏(William Bourne)在《旅行者珍宝》中的涉华部分,对土伯特省的叙述采库宁罕所述,唯一不同的是他为土伯特加上经纬度:“经度168度,纬度3度20分,距离伦敦东偏东南7670英里,月变时间晚9小时44分钟;最长的一天是12小

<sup>1</sup>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1954(1936)年,第277-280页。

<sup>2</sup> uno grande regno che si chiama Tibot/Tybot. Desideri, Ippolito. *II Tibet*. 1904. p. xxiii, xxv.

<sup>3</sup> Berthold Laufer, “Was Odoric of Pordenone ever in Tibet?” *T'oung Pao*, Vol. XV. Leiden, 1914. Sven Hedin, “Early European Knowledge of Tibet”, *Geografiska Annaler*, Vol. 1 (1919), pp. 290-339, esp. p. 305.

<sup>4</sup> 此外,欧洲知识界对有关鞑靼的知识的整合,早于和重于对有关土伯特的知识的整合(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age*. 1613. pp. 335-342);而在他们发现“知纳”(China)这个地理概念以后,其重点又转而整合不同时代有关知纳的地理知识系统:从托勒密的地理分类系统、蒙元时代的地理分类直至新的有关知纳的分类系统。

<sup>5</sup> Hakluyt, Richard. *The principal nau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u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made by sea or ouer-land, to the remote and farthest distant quarters of the earth, at any time within the compasse of these 1600 Yeres*. London. 1599-1600. Vol. 2, pp. 52, 64.

<sup>6</sup> Purchas, Samuel. *Purchas his pilgrimage*. London: William Stansby. 1613: 361

<sup>7</sup> Purchas, Samuel. *Purchas his pilgrimes*. London: William Stansby. 1625. P.23.

<sup>8</sup> 一般认为,欧洲的民族-国家观念始自十七世纪中期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十九世纪以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定型。笔者对此稍有不同意见,认为欧洲在此之前尚有一个古式的民族-国家观念时期。因篇幅和文章主旨,此不赘述。

<sup>9</sup> Cuningham, William. *The cosmographical glasse conteinyng the pleasant principles of cosmographie, geographie, hydrographie, or nauigation*. Londini. 1559. p. 197.





时 10 分钟。”<sup>1</sup> 这表明它是一个地点，而不是一个区域。<sup>2</sup>费吉 (Robert Fage) 以“土伯特”为城市名。1658 年他在《世界素描》中说鞑靼最著名的五座城市是土伯特、撒马尔罕、汗八里 (北京)、大都或鞑靼以及匝斯贝 (Zaaspe) 等。<sup>3</sup>这个传统延续甚久。1794 年，鲍德温 (G. A. Baldwin) 在新系统地理学中提出亚洲六区域的第五区为大鞑靼，其第三部为蒙古鞑靼，主要城市即土伯特<sup>4</sup>。

黑棱 (Peter Heylyn) 注意到上述土伯特所指或为区域或为地点的两难，在《宇宙志四书》(1652 年) 中提出，“土伯特” (Thebet) 区域之得名，乃是取自同名的城市。此城是“法师” (Abassi) 即偶像崇拜者教宗的首府，其经纬度是：经度 138 度 50 分，纬度 44 度 0 分。<sup>5</sup> 若以当时福岛的零度经线 (格林威治以西 14 度) 起算，此坐标地当在今吉林省长春市西北马家窝堡一带。

意大利思想家博特罗 (Giovanni Botero) 曾在《世界最著诸国史记》(1601) 中谈到史上最伟大的鞑靼帝国，说其下“有诸多伟大的王国和强大的省，比如唐古特，”以及诸如“哈刺章、土伯特和建都”等。<sup>6</sup>这是马可波罗的知识体系。他为什么只提这些部分呢？我们遇到欧洲知识界变动中的亚洲地理分类体系。

### 把土伯特归入“鞑靼”范畴

十四世纪中期蒙元崩溃、明朝代兴。欧洲知识界并没有及时掌握这一历史变动；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一变动才以“知纳”话语的出现并突出地以其升起得到曲折反映。博特罗已经把鞑靼帝国跟欧洲刚发现不久的“知纳”王国分开。他们最初把土伯特归属鞑靼帝国，后来才将之归属到“知纳”之中。

他们为何把这一区域归入鞑靼区域？这归功于马可波罗：他报道土伯特臣服于鞑靼大汗<sup>7</sup>。1613 年，普查斯在他的《朝圣记》第九章述及鞑靼原初居住地是在贝尔金 (Belgian) 山之外，内中有不同民族，总称莫格利 (Mogli)，包括七大部落如鞑靼、唐古特和土伯特 (Tebeth) 等；成吉思汗时征服诸部，但它们依旧沿用鞑靼这个名字<sup>8</sup>。1615 年艾维特 (Pierre d'Avity) 在《世界政体记》中对鞑靼帝国麾下诸王国、诸省的信息，无疑也是来自马可波罗游记<sup>9</sup>。他们用以理解超王国的中国体系的唯一知识资源是欧洲的帝国观。

1646 年，英国作者司笔 (John Speed) 著《世界各著名地展望》，把契丹界定为成吉思汗真正的后嗣鞑靼大汗的帝国，在南部与知纳以长城为界隔开；其下诸省包括契丹、唐古特、喀慕、太原府和土伯特等。他说这些省份相互没有多大差异，也跟属于契丹王国的其他鞑靼部分差别不大。<sup>10</sup>

<sup>1</sup> Bourne, William. *A booke called the treasure for traueilers*. London: By Thomas Dawson. 1578. pp.20-21.

<sup>2</sup> 这些数据给人的印象是土伯特所在地的位置“准确”得不容置疑。从其时极具绘制者梦幻 (fantasy) 想象的地图来看，康塔尼利 (Contarini) 根据当时各种版本的曼德维尔旅行记 (其实他把这说成是一个 isle，这可能是岛屿，有可能是高出周边的群山) 在 1506 年制作的地图把土伯特置于海岸边，离当时发现的加利福尼亚不远。稍后瑟维绒 (Jan Severzoon, 1520)、范恩 (Oronce Fine, 1531) 和加拉颇达 (Callapoda, 1561) 的地图踵之。1544 年塞巴斯蒂安 (Sebastian Cabot) 地图把土伯特 (Thibiote) 置于里海以北。在康塔尼利前后，也有绘图者根据马可波罗的材料，把土伯特置于印度、蛮子和契丹之间，或孟加拉、唐古特、蛮子等之间。Braham Norwick, "Locating Tibet--The Maps," pp. 307, 309.

<sup>3</sup> Fage, Robert. *A 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world*. London: J. Owsley. 1658. p. 54.

<sup>4</sup> Baldwin, George Augustus. *A new, royal, authentic, complete, and universal system of geography*. London: 1794. Book II, p.3.

<sup>5</sup> Heylyn, *Cosmographie in four bookes*. 1652. pp. 3: 202, 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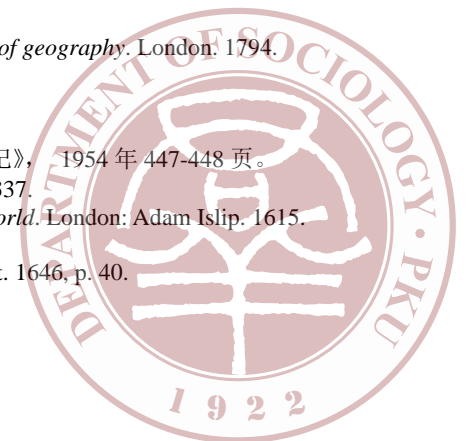
<sup>6</sup> Botero, Giovanni. *The traueilers breuiat*. London: Bollifant. 1601.

<sup>7</sup> Polo, Marc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1938, p. 271.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1954 年 447-448 页。

<sup>8</sup> Purchas, Samuel. *Purchas his pilgrimage*. London: William Stansby. 1613. pp. 335, 337.

<sup>9</sup> Avity, Pierre d', sieur de Montmartin. *The estates, empires, & principallities of the world*. London: Adam Islip. 1615. pp. 700-702, 708, 714.

<sup>10</sup> Speed, John. *A prospect of the most famous parts of the vworld*. London: John Legatt. 1646, p. 40.



1652 年黑棱提出古代鞑靼最著名的区域有六，首推土伯特，最末才是鞑靼；鞑靼分为五部落，包括蒙古、叶赫蒙古（或称大蒙古）、索漠蒙古（水蒙古）等。成吉思汗压服五部后，复占有土伯特和唐古特。诸部首长把他扶上放在毛毡之上的座位，尊称他为王。<sup>1</sup>类似的说法亦见法国耶稣会士神学家佩道（Denis Petau）所著《世界史》（1659）。经这一编排，土伯特俨然成为古鞑靼的一部分。<sup>2</sup>

来自实地的信息也“坐实”这是鞑靼之地。1667 年基歇尔根据白乃心提供的游历报告，在《中国图说》中说从西宁越过卡尔梅克沙漠，用三个月的时间到拉萨。这段路上“鞑靼牧民习惯了沙漠的环境，在一定的季节游牧于这个地区。”<sup>3</sup>如果说此前这个广阔区域都是由想象的鞑靼区域来支撑的话，这个报告用实在的材料填充之，使之丰满起来。类似的填充如 1673 年汪勒（Nathaniel Wanley）受鄂多立克记载和前述以土伯特为鞑靼之区的影响，在《小世界奇事》中谈到“在土伯特（Thebet）的鞑靼人中”以头骨做碗的风俗。<sup>4</sup>

1679 年塞勒（John Seller）在《小地图集》中，正式排出土伯特在大鞑靼（亚洲鞑靼）的地位：大鞑靼分为五部分：沙漠鞑靼、乌兹别克鞑靼、土耳其斯坦、契丹和真鞑靼。土耳其斯坦有四部，依次是察理斯（Chialis；莫登[Robert Morden]认为此即吐鲁番）、和田（Chiartiam）、土伯特和契丹湖。<sup>5</sup>稍后在《新地理学》（1681）给出的印度地图中，可以看到高加索山（即喜马拉雅山）以北都属于鞑靼，另有小字写出土伯特（Thibet or Thobrot）土耳其斯坦字样，东邻知纳。这样大莫卧儿帝国的北邻就是土耳其斯坦，而不是土伯特；而鞑靼部分也只需涉及土耳其斯坦，无需提及土伯特。<sup>6</sup>不过，1685 年塞勒在《新地理学系统》中把亚洲分为九部，最末为鞑靼，下含撒马尔罕、别克（Bekh）、喀什噶尔、土伯特、唐古特和卡尔梅克等六区。<sup>7</sup>1682 年尚柏林（P. C. Chamberlayne）和散荪（Nicolas Sanson）的地理学著作中也沿袭这一分类，把土伯特和土耳其斯坦等同，居乌兹别克以东，属大鞑靼的一部分，土伯特国有同名的城市土伯特与和田（Chotan）。<sup>8</sup>踵其后以土伯特归属土耳其斯坦的还有杜瓦勒（P. Duval）和莫登等。<sup>9</sup>

## 1580 年代以后的新知

十六世纪末，欧洲关于土伯特的知识，因耶稣会士在喜马拉雅山西部和英国商人费其（Ralph Fitch）等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地带的活动而得到更新，伴随而来的是新的称呼、新的知识。1582 年耶稣会士阿卦维瓦（Rodolfo Acquaviva）在写给罗马的信中提到一个叫博坦（Bottan）的山地民族（nation），指的就是土伯特；费其也提到孟加拉以北的博坦人（Bottanter）。随后耶稣会士们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报告中所使用的名字，紧紧地跟这两个名字相联，因撰写者母语的关系，在 Botenti 和 Pettent 之间变动；而他们之选择性地使用“Potente”（强大的），则有寻求欧洲后方资助的意图。当欧洲学界较多地使用 Tebet 及其变体时，这个新名词就一度消失，直到十七、十

<sup>1</sup> Heylyn, Peter. *Cosmographie in four bookes*. London. 1652. pp. 3: 202-203.

<sup>2</sup> Petau, Denis. *The history of the vworld: or, an account of time*. London: J. Streater. 1659. pp. 77-80.

<sup>3</sup>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年，319 页。

<sup>4</sup> Wanley, Nathaniel. *The wonders of the little world*. London. 1673. p.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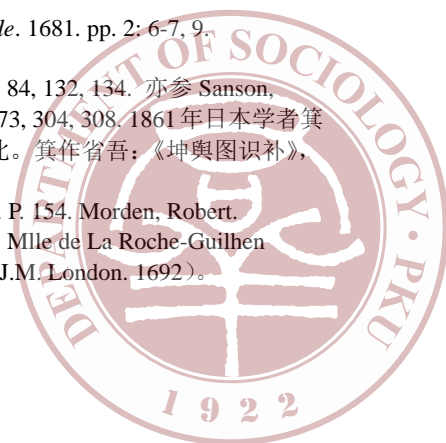
<sup>5</sup> Seller, John. *Atlas minimus*. London. 1679. p. 50.

<sup>6</sup> Moore, A new geography with maps to each country, and tables of longitude & latitude. 1681. pp. 2: 6-7, 9.

<sup>7</sup> Seller, John. *A new systeme of geography*. London. 1685. 113-114 面。

<sup>8</sup> Chamberlayne, Peregrine Clifford. *Compendium geographicum*. London. 1682. pp. 7, 84, 132, 134. 亦参 Sanson, Nicolas (1600-1667). *Cosmography and geography*. London: S. Roycroft. 1682. pp. 273, 304, 308. 1861 年日本学者箕作省吾沿袭西方地理分类，把和田和图伯特归为一个地理单元，其源头即在于此。箕作省吾：《坤輿图识补》，美作梦霞楼，弘化 2 年（1861），卷 1，6-7 页。

<sup>9</sup> Duval, P. *Geographia universalis*. Trans. by Ferrand Spence. London: H. Clark. 1685. P. 154. Morden, Robert. *Geography rectified*. London. 1688. p. 391. 1692 年，在土伯特归属鞑靼的主题下，Mlle de La Roche-Guilhen (1644-1707) 写出爱情历史剧《成吉思汗》（*Zingis a Tartarian History*. trans. by J.M. London. 1692）。



八世纪之交才用来专指不丹。<sup>1</sup>

意大利传教士伯立在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待了多年以后写给教皇的意大利文报告，提到该地生产的丝绸销到老挝（Lais）王国，再从那里销往土伯特（Thibet）王国：因为这丝绸尽管不如知纳的那般精良、精致，但却更粗更耐用。<sup>2</sup>从今日的地理格局来看，老挝与中国藏文化区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为什么伯立会单单提及土伯特王国？这着实让人费解。耶稣会士 1628 年前后在日喀则时发现卫藏东邻交趾知纳，<sup>3</sup>这可能是最好的解释。无论怎样，这一观念导致的逻辑后果就是：老挝跟土伯特接壤。这跟下文所述欧洲学者以莫卧儿跟云南-四川接壤造成的逻辑后果类似。由此可见，伯立所说的土伯特，不应当是鲁布鲁克、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等所至的土伯特。

曾德昭（1585-1658）在华多年，著有《中华帝国史》行世（1642）。<sup>4</sup>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土伯特”的西班牙文写法 Tibet（英译本沿用）这一后世的通用名，但这不是最早的，因为 1640 年代以前吕布朗（Vincent Leblanc, 1554—ca.1640）在《世界考察记》中已经把 Tebet 跟 Tibet 视为同一。他提到来自土伯特（Tebet or Tibet）大王国和契丹的报告<sup>5</sup>。来自土伯特大王国的报道，当即安夺德所写的报道<sup>6</sup>。现在比较确定的是早在 1624 年，安夺德在第一份有关古格的葡萄牙文报告中就已经使用 Tibet 这个拼写法，<sup>7</sup>并非此前所说的十八世纪。<sup>8</sup>新的拼写法与前述有关土伯特的知识传统无关：它来自于新的实地信息。

安夺德在扎布让传教，<sup>9</sup>从当地人那里初步了解当地的地理分类，对“土伯特”有了更多的补充。他在 1626 年写的报道中认为，土伯特（Tibèt）由古格（Coguè）、拉达克（Ladac）、玛域（Mariul）、日土（Rudoc）、卫藏（Vtsana）和另两个位于东边的王国组成，这些王国加上大蒙古（Sopò）王国，总称为大鞑靼。后者一部分邻近知纳，一部分接壤莫斯科，称为大鞑靼帝国，据称有上百贡税国（tributarij）<sup>10</sup>。伍昆明认为他所说的两个东部王国是康和安多<sup>11</sup>。从当时的分类来看，这是可能的，但它们并非王国<sup>12</sup>。安夺德氏显然不知道明朝对乌斯藏的多封众建政策和乌斯藏僧侣前往大明朝廷朝贡、受封和任职、西藏文明东向发展<sup>13</sup>的情况，亦不知此际噶举派势力正盛，卫藏地区的世俗权力由藏巴汗掌管。如果他了解这些情况，欧洲的政体观能解释这种复杂的关系格局吗？根据当代人类学家散繆的看法，不能用欧洲的国家概念来理解藏区的政体；跨区

<sup>1</sup> Gandolfo, Romolo. *Bhutan and Tibet in European Cartography (1597-1800)*, pp. 96-101.

<sup>2</sup> Borri, Cristoforo. *Cochin-China containing many admirable rarities and singularities of that country*. London: Robert Raworth. 1633. 第十四面。

<sup>3</sup>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 年，302 页。

<sup>4</sup> Samedo, Alvaro. *Imperio de la China*. Madrid, 1642;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London: E. Tyler. 1655.

<sup>5</sup> Leblanc, Vincent. *The world surveyed*. London. 1660. p. 83.

<sup>6</sup> “An Appendix: or Special Remarks Taken at Large Out of Athanasius Kircher's Antiquities of China,” In Nieuhof, Johanne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London. 1669. p. 26.

<sup>7</sup> Andrade, António d', Venceslao Pantaleone. *Lettere Annve Del Tibet Del MDCXXVI, E Della Cina Del MDCXXIV*. Roma: Corbelletti. 1628. p. 3. 此前维基百科认为英文 Tibet 这个词最早是 1774 年英国人波格尔的报告中首次使用。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bet#Names\\_](http://en.wikipedia.org/wiki/Tibet#Names_) 访问时间：2015 年 2 月 24 日 23:12。

<sup>8</s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bet#Names> accessed: June 1, 2018. 12:30.

<sup>9</sup>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C3%B3nio\\_de\\_Andrade](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C3%B3nio_de_Andrade). 访问时间：2015 年 2 月 24 日 23:12。

<sup>10</sup> Andrade, António d', Venceslao Pantaleone. *Lettere Annve Del Tibet Del MDCXXVI, E Della Cina Del MDCXXIV*. Roma: Corbelletti. 1628. pp. 5-6. 亦参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 年，187 页。

<sup>11</sup>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 年，187 页。

<sup>12</sup> 有关这些区域的形成，可参叶拉太：“古代藏族地域概念的形成与演变”，《中国藏学》2013 年第 2 期；石硕：“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中国藏学》2014 年第 3 期。

<sup>13</sup>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沈卫荣，“评美国藏学家魏里的《明朝的喇嘛进贡》——兼论元明时期的西藏政策”，《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 2 期；稍早，有李铁铮和杜恒泽氏的著述；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学者的丰富研究，亦参王启龙、邓小咏：“20 世纪上半叶藏区政治研究评述”，《西藏研究》2002 年 2 期。





域相互交错的教派治理才是当地的政治形式。<sup>1</sup>安夺德没看到这些复杂性，所以只简单地沿袭欧洲的既有知识传统，把土伯特归入鞑靼帝国。

在他的建议下，孟加拉耶稣会负责人派传教士卡塞拉和卡布拉尔等人经不丹前往卫藏，最终前往契丹，以确定其所在。当他们在不丹了解到当地的地理知识体系时，如何把它跟欧洲既有的地理分类系统整合，成为当务之急。1626年卡塞拉的报告把索波等同于欧洲人理解的鞑靼，把藏传佛教中的想象地香巴拉（Ximbala）理解为契丹，把甲那（Guena）理解为知纳，而土伯特即博坦（Potente）。卡布拉尔在1628年写的报告中说卫藏北邻鞑靼，东边是交趾知纳；他认为香巴拉不是契丹而是鞑靼，更靠北。诚如伍昆明批评的那样，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当时藏区的这些部分“均属中国管辖的地区。”<sup>2</sup>无论怎样，我们也看到新知对欧洲既有地理知识谱系带来的巨大扰动。

1661年，汤若望挑选白乃心和吴尔铎从北京经土伯特前往欧洲。他们从北京出发，经西宁，越过鞑靼的卡尔梅克沙漠，三个月后到达鞑靼人称为巴兰托拉（Barantola）的拉萨王国（Regni Lhasa）；他们在拉萨待一个多月后前往尼泊尔。<sup>3</sup>这个新出现的“拉萨王国”如何整合到既有的地理知识谱系之中呢？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把马可波罗、安夺德和白乃心的记录整合到一起。他说：“现在天德（Tenduc）是鞑靼的一个王国；鞑靼是由许多其他王国组成的，譬如拉萨王国（此即鞑靼人所称的巴兰托拉），内特尔（Nethel）、土伯特（Tibeth）、马朗加（Maranga）等王国，以及卡尔梅克沙漠，它与知纳人之长城接壤。绝大多数地理学家把知纳王国与契丹王国混淆”；通往天德的路向东经过高加索的斜石坡三日以后，即来到世界最高山，当地人称为朗古尔（Langur），是拉萨王国最高的山。这个地区叫贝拉日（Belor）王国，即契丹的约翰长老的主要王国；王国东边的人群，当地人称土伯特（Thebeth）；有一座至为壮丽辉煌、举世无双的城市，即土伯特王国的扎布让（Chaparangu）城，其首府是拉达克（Radoc）；土伯特王国是大契丹所属王国之一。大契丹包括知纳人长城的内外。<sup>4</sup>

在华耶稣会士们从知纳获得了解土伯特的新途径和新信息。1642年曾德昭在《中华帝国史》中提到，从陕西省有商队前往强大的Tibet王国，带有多种商品，尤其是丝绸制品、波斯蓝和茶。<sup>5</sup>曾德昭确定汉文中的乌斯藏和土伯特即安夺德、吕布朗等人所理解的Tibet。这是欧洲学界首次将一个欧洲概念跟汉文的“吐蕃”对应起来，从而沟通此前没有交集的两个文献体。卫匡国继承这一传统。1654年，他在《鞑靼战纪》中提及四川省与土伯特王国接壤<sup>6</sup>，稍后在《知纳上古史》中提及汉文献中的吐蕃王国<sup>7</sup>。但无论曾德昭还是卫匡国，都不了解明朝对乌斯藏实施的多封众建，以及其时第五世达赖喇嘛为清朝皇帝、后妃、太子、诸亲王授灌顶，并受封于清廷的历史。1669年奥利瑞尔（Adam Olearius, 1603-1671）《使节旅程集》中把土伯特（Tibet/ Tebet）王国跟云南西北、四川西边、陕西之西和西北一带、长城西端接壤。不过，该著另一处又提到知纳的“西边是Kiang、Vusucang和Bengala诸王国。”<sup>8</sup>最后一个可以确定为孟加拉（利玛窦作榜葛刺）；前

<sup>1</sup> Samuel, Geoffrey. *Civilized Sha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

<sup>2</sup>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年，281-283、302-303、304页。

<sup>3</sup>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年，319、323-3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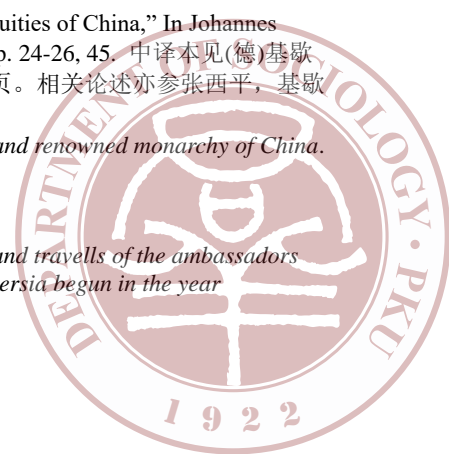
<sup>4</sup> “An Appendix: or Special Remarks Taken at Large Out of Athanasius Kircher's Antiquities of China,” In Johannes Nieuh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1669. pp. 24-26, 45. 中译本见(德)基歇尔，《中国图说》，张西平等译；出版社：大象出版社。2010年106-108，156页。相关论述亦参张西平，基歇尔笔下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秋之卷。

<sup>5</sup> Semedo, Alvaro. *Imperio de la China*. Madrid, 1642, p. 28.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London: E. Tyler. 1655, p.19.

<sup>6</sup> Semedo,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1655. p. 304.

<sup>7</sup> Martino Martini.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Monarchii. 1658. p. 311.

<sup>8</sup> *The Voyages and Travels of J. Albert de Mandelslo*. In Olearius, Adam. *The voyages and travells of the ambassadors sent by Frederick, Duke of Holstein, to the Great Duke of Muscovy and the King of Persia begun in the year*



两个名字却让人费解。基歇尔显然把 Kiang 视为长江<sup>1</sup>；1904 年卡罗谈到“江”以外的另一个 Kiang：这是一个具有土伯特“血缘”的部落群体，汉人称为 Kiang，来自三苗<sup>2</sup>。据此奥利瑞尔所说的 Kiang 应确定为羌。至于 Vusucang，安文思著中注说：安夺德所说的卫藏（Usangué）必定是卫匡国所说的乌斯藏（Usuçang），在汉人叫做西番的国土内，位于四川省以西<sup>3</sup>。确定这三个王国以后，我们就明白奥利瑞尔用了两套地理观念：一是欧洲地理系统，用以说明土伯特王国，一是汉文献中的地理系统，用以说明知纳之西的诸王国；它们在奥利瑞尔书中显然没有交集，给人的印象是土伯特王国与乌斯藏和羌等三王国并存。可见，这两套来自于不同文献但实际所指有重合的地理知识系统，尚未得到整合。

类似的二重性如 1667 年安文思在《中国新史》中提到知纳最西的陕西省，其西北有一王国，印度人称为 Tibet，西鞑靼人却称之为 Tumet，与陕西和山西两省接壤；他又提到乌斯藏王国与四川省接壤<sup>4</sup>。Tumet 当为蒙古土默特部；而“乌斯藏”则来自汉文文献。把土默特视为土伯特，是基于音似的任意联想；把乌斯藏与土伯特并列显然是因为两套知识体系尚未得到整合。

1673 年欧格尔毕（John Ogilby, 1600-1676）在《亚洲》一书中说大莫卧儿的北方接壤“乌兹别克、土伯特（Tibeth）的群山、斯利那加、扎布让和拉达克诸王国。”此处扎布让和拉达克显然不属于 Tibeth；但同时他又提到莫卧儿王国的东边跟土伯特（Thebet）和白枸（Pegou）诸王国接壤，<sup>5</sup>表明 Thebet 包含扎布让和拉达克。他所说的 Thebet 王国跟包括群山的 Tibeth 当然不是同一个所指。

无论怎样，这些符号的多样已经复杂到需要厘清的地步。

## 欧洲汉学的二重知纳观

克路士和拉达，尤其是 1585 年发表汉学巨著《大中华王国最著礼俗风物史记》<sup>6</sup>的门多萨等对知纳的理解，有两重。

1550 年代，伯来拉首先确定知纳的版图共十三个省，但除与鞑靼的边界稍微清晰外，其余皆不清楚。1569 年克路士具体地确定知纳的疆域范围。在他眼中，知纳和俄罗斯、日耳曼、印度、交趾知纳、老挝、缅甸、孟加拉、莫卧儿的信度和德里国、鞑靼等接壤。他为之划出广阔的范围后，又具体地罗列出其十三省。这两种理解可分别称之为外围知纳和省部知纳。前者范围且是动态的：他认为知纳在历史上曾统治过印度、东南亚的爪哇、马六甲、暹罗、占城以及琉球等，后来国王主动放弃那些地方，将军队撤回<sup>7</sup>。诸省和这个广阔疆域之间存在着模糊不清的地带；外围知纳极其庞大，土伯特当然在其内；但省部知纳的十三省中又没有土伯特。这个矛盾有待解决。

1575 年，拉达去掉外围知纳的划分，仅确定出东部海岸线和其北方边界长城：长城外有许多城镇，是对付鞑靼人的边哨，知纳的国王在那里派有两名总督和三员大将。此外，他一列举出十五省的地理位置，这就差不多划出知纳的版图<sup>8</sup>。

---

M.DC.XXXIII. and finish'd in M.DC.XXXIX. London. 1669. pp. 173, 175-176, 179.

<sup>1</sup> Kircher, Athanasius. *China monumentis*. Amstelodami. 1667, p. 165.

<sup>2</sup> Carlo Puini, "Notizie", in Desideri, Ippolito. *Il Tibet*, 1904. p. xxxix.

<sup>3</sup> 安文思：《中国新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 15 页；Magalhães, Gabriel de. *A new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Thomas Newborough. 1688. p. 31.

<sup>4</sup> Magalhães, *A new history of China*. 1688. pp. 321, 3.

<sup>5</sup> Ogilby, John. *Asia*. London. 1671. p. 156.

<sup>6</sup> Mendoza, Juan González de. *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Rome. 1585.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sup>7</sup> 伯来拉、克路士等：《南明行纪》，1999 年 63-65, 87-88, 105-120 页。

<sup>8</sup> Rada, Martin de. "Relacion del Viage que se hizo Alatierra de la China," in *Revista Agustiniana Dedicada al Santo Obispo de Hipona en su Admirable Conversión á la fe*. Valladolid. 1884, vol. viii; pp. 203-04; 伯来拉、克路士等；



门多萨（1585）对伯来拉、克路士和拉达的观点加以综合：一方面，知纳的东部是海洋，西面毗邻交趾知纳、缅甸、与缅甸接壤的巴坦人和以撒马尔罕（今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为首府的莫卧儿等，西南是苏门答腊、爪哇、琉球还有日本，北边隔长城与鞑靼邻接；但另一方面，知纳又只有限定的十五省（两京和十三省），尽管门多萨没有举出它们的边界。<sup>1</sup>

1646年司笔（John Speed）在《世界各著名地展望》中通过凸显此前的中华帝国观来继承他们的二重知纳意象：“斯是巨大帝国，从北回归线至北极的五十三度，几四十度；从东经130至160度，总30度；西接印度斯坦、恒河分隔后朝向欧洲一边的东印度部分，东达秦（Cin）海，北界大汗之帝国，以高山和第117世王秦始皇所筑上千英里之长城与汉人隔开；南为交趾知纳王国，这是东印度恒河以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无疑包含今天的西藏、新疆、中亚等，但在具体介绍帝国的组成部分时却一下缩小到门多萨所说的十五省。<sup>2</sup>

二重知纳观尚有另一表述。皮嘎菲特（Antoni Pigafetta）参加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随船队回到欧洲后著有航行记（1536年出版），谈到伟大知纳的国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名叫Santoa Raja。据说，知纳的国王在其帝国之下有70名国王臣服；而后者中每一个下面都有十到十五个国王依附；大印度地区的君主以及此前提及的君主都臣服于他，是他的真正封臣。<sup>3</sup>欧洲航海者在东南亚发现的是中国的庞大朝贡体系，它的意义在后世得到回应，此即利玛窦和曾德昭等人为消弭二重知纳观的困难，根据所掌握的汉文材料，首次注意到其朝贡体系。据考，利玛窦是从罗洪先（1504-1564）的《广舆图》<sup>4</sup>中得知，东方有三个国家、西方有五十三个以上的国家、南方有五十五个以上国家以及北方三个国家向中华大王国朝贡，但利玛窦并没有列出这些朝贡国的名字。这一并非无意的忽略使得那些令欧洲框架尴尬的地理范畴消失，不阻碍他们继续建构中国为民族-国家的工程。曾德昭关于中国朝贡体系的知识袭自利玛窦，没有发展，但对十五省的了解则胜出甚多。<sup>5</sup>这一畸重跟利玛窦的忽略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我们在利玛窦的《中国札记》（1615）和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1642）中发现，二重知纳观虽然以非常确定、界定清晰的十五省和庞大的朝贡体系呈现出来，但内在的困境依旧。

观《广舆图》的“舆地总图”，朵甘思、乌斯藏、土伯特、董卜、韩胡、碉门等赫然在列，其“西夷”条内亦列出西番即土伯特，下含乌斯藏、朵甘思等。由此可见，他们之弱化中国朝贡体系的意义，实因其用以理解中国的欧洲族性地理框架无法完全包容中国体系所致。

外围知纳和作为朝贡体系的知纳在表现形式上略有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

有意思的是，欧洲学界却曾把土伯特归属于另一个概念：契丹（Cathay；或译震旦）。契丹概念在欧洲得到流传归功于马可波罗。他根据元代的观念把中国分为北部的契丹和南方的蛮子两部。1595年以后，印度的耶稣会士已经在探寻契丹、知纳和土伯特的关系，其中沙勿略用功最勤。<sup>6</sup>1575年拉达提出契丹即为知纳后，利玛窦在1596年专门考证，鄂本笃在1602-1604年的实地探索，皆坐实拉达所论。<sup>7</sup>耶稣会士安夺德在1624年在扎布让写的报告，发表时出版者加的标

《南明行纪》，1999年260-263页。

<sup>1</sup>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1998年第2-3、20-21页。

<sup>2</sup> Speed, John. *A prospect of the most famous parts of the vworld*. London: John Legatt. 1646, pp. 37-38.

<sup>3</sup> Pigafetta, Antonio. "A briefe declaration of the viage or nauigation made about the worlde", in Pietro Martire Anghiere. *The 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VWest and East Indies*. London: Richard Jugge. 1577. pp. 445-46.

<sup>4</sup> 计翔翔指出，此图系自朱思本《舆地图》改编而来。氏著：《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65页。

<sup>5</sup>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7-9页。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0-26, 116页。

<sup>6</sup>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年，82-83页。

<sup>7</sup> 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185页；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1983年549-559页；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年，84-85、97-107页。亦参张锐：《16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题和报告中都提及“对大契丹或土伯特王国的新发现”，他们显然认为土伯特就是契丹<sup>1</sup>。后世的基歇尔<sup>2</sup>、克拉普洛斯（Klaproth）、列维（Levi）、麦克罕等都接受他的说法，结合利玛窦的观点，认为安夺德最终到的地方是知纳。<sup>3</sup>因此，安夺德的观点加重二重知纳观的困境。

牛合孚出使中国大清后所写的著作（1669）中亦可见类似的二重知纳：一方面十五省中南方的一些省份跟土伯特接壤，这就有很具体的范围；但另一方面知纳又隔沙漠与撒马尔罕和喀什噶尔两王国相邻，还远达孟加拉，远达把知纳跟鞑靼和印度分隔开来的大马士革群山；尤其是其第三王国陕西的西部边界越过鞑靼王国唐努<sup>4</sup>。文字表述的这种二重性根本没法在地图上直观地表达出来。<sup>5</sup>

欧洲地理学界的二重知纳难题因大清一统之后欧洲传教士们逐渐发现这个“帝国”远超过十五省的范围而得到较好的缓解：一方面“知纳本部”（大致相当于十五或十八省）概念得以发展，另一方面“知纳帝国”所指得以扩展，填补二重知纳说的二重之间的模糊地带。1802年平克尔顿的《现代地理学》是我们所知第一部将土伯特纳入欧洲的中华帝国话语中加以叙述的地理学著作。“帝国”或许是欧洲唯一逼近中国体系的概念，但仍有不小的差异，首先就是因为它无法准确地理解庞大的朝贡体系，譬如尼泊尔向清廷朝贡。

## 二重土伯特观与对统一土伯特之想象

安夺德提到Tibet的诸组成部分，实际上其时藏文中并没有一个统一青藏高原的地理概念，是他把此名冠于当地的地理分类之上，这一分类很长时间都不为欧洲知识界所接受。相反，二重土伯特的意象丛生。

1673年欧格尔毕在《亚洲》一书中已经使用“大土伯特（Tibet）”、“大小土伯特之王国”等概念<sup>6</sup>，以说明这一地理单元内的差异性。与他一样，法国作者本尼尔稍后谈到在莫卧儿王国内晚近斗争中的失败者穿过荒无人烟的区域和群山，逃往“大土伯特”（the greater/great Tibet），尽管最终仍然被抓回。<sup>7</sup>

就我们目前所知，将土伯特分为大小两部分，很可能是法国旅行者达卫理（Jean-Baptiste

---

年第1辑。利玛窦的著作经金尼阁的译述、加工，在1615年面世后，很快译为其他语言在欧洲广泛流传。

<sup>1</sup> Andrade, António de, S.J. *Novo Descobrimento do Gram Catayo, ou Reinos de Tibet / pello Padre Antonio Andrade da Companhia de Jesu, Portugez, no anno de 1624*. Lisboa: Mattheus Pinheiro, 1626. p.1.

<sup>2</sup> “An Appendix: or Special Remarks Taken at Large Out of Athanasius Kircher's Antiquities of China,” In Johannes Nieuhof,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1669. p. 35.

<sup>3</sup>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年，173页。有个例外。1688年莫登的《修正版地理学》认为古代所说的长老约翰之国在亚洲；此即与中华帝国北边和西边接壤，古代称为契丹，实即土伯特的地方。他还引白乃心神父等的旅程和所见、中华帝国皇帝1683年前往西鞑靼的旅程为证。这是把契丹挪到土伯特来实现的。他还把土伯特等同于天德和唐古特。在所有涉及土伯特的古代欧洲文献中，莫登的修正意见引起的古代地理学争议是最大的。见 Morden, Robert, d. 1703. *Geography rectified*. London. 1688. p. 391-393. 不过，1693年艾吾瑞尔却部分支持他的观点，认为住在天德（Tanchut）鞑靼王国的达赖喇嘛（Dalaè-Lama）是此前统治那里的著名的长老约翰的真正继承者，只不过他在宗教腐败时进行变革，成了偶像崇拜者而已。见 Avril, Philippe. *Travels into divers parts of Europe and Asia*. London. 1693. pp. 162-163.

<sup>4</sup> “An Appendix,” In Nieuhof, Johanne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1669. pp. 7, 10. 卷首地图。

<sup>5</sup> 从信息方面来说，欧洲-西方汉学中二重知纳产生的原因是他们从两个渠道获得有关知纳的信息。一个渠道是从周边实地了解到中国朝贡体系的影响，一是从大明内部获得的大明地图、輿地信息。朝贡体系无法在地图上表达，而李晓聪则认为，除了及少为人知的《大明混一图》，大明其余的地图中，版图最西只到今甘肃一带，北方是秦汉时修筑的长城。当欧洲人把主权观念植入这一版图，版图外即被认定为非中国主权的部分，而他们则根据想象将其殖民的范围推到这个边界。

<sup>6</sup> “The Kingdom of great and little Tibet”. Ogilby, John. *Asia*. London. 1673. pp. 202, 199.

<sup>7</sup> Ogilby, John. *Asia*. London. 1671. P. 156. p. 191. Bernier, François.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revolution of the empire of the Great Mogol*. London. 1676. p. 165.



Tavernier) 在 1665 年随大莫卧儿军队前往克什米尔王国以后根据所得新知而作出的区分<sup>1</sup>: 他在第九封信中谈到他跟小土伯特王族的一名王位继任者交流后, 得知其国之东即大土伯特; 十七、八年前莫卧儿王沙热亚曾派军前往围攻, 试图成为大土伯特王国之主。大土伯特国王曾派使节前往莫卧儿交涉, 其随员中有一名来自拉萨王国的喇嘛医生。达卫理还得知二十年前有商队从克什米尔出发, 穿越大土伯特的群山, 进入鞑靼, 三个月后到达契丹, 后来大土伯特国王关闭这条通道; 商队便改走恒河, 经巴特纳 (Patna) 直接前往拉萨王国。<sup>2</sup>可知大土伯特王国介于小土伯特王国和拉萨王国之间, 更接近小土伯特王国。

1669 年牛合孚 (Johannes Nieuhof) 的著中, 二重土伯特的问题出现, 并跟二重知纳观发生联系。他说知纳“南方的一些省份, 跟约翰长老的诸王国、Geo (汉人以一个名字西番来统称之), 以及土伯特 (Tibet)、老挝和缅甸接壤。”在述及其第三王国陕西时他又说: “它与约翰长老的诸王国、喀什噶尔和土伯特 (汉文统一以西番来称呼之) 接壤。”云南省的西北部与西番王国接壤<sup>3</sup>。在他看来, 土伯特和 Geo 就是汉文所说的西番, 但 Geo 跟土伯特并列, 是否同一不知。该书后面所附基歇尔《中国图说》之见, 把拉萨王国和土伯特王国并列。<sup>4</sup> 因此, 二重土伯特的议题是: 一方面, 欧洲学界愈来愈一致地用同一个符号来理解这片广袤的区域, 其与所指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 另一方面, 土伯特王国仅是诸多王国之一, 且不具有代表性。

土伯特和知纳都是欧洲-西方假想为当地的名字, 尽管有其来龙去脉, 却被想象为应然和必然的。它们最多是逼近当地理解的世界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说, 二重土伯特观和二重知纳观是其东方学想象他者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二重土伯特观和二重知纳观, 是欧洲-西方现代正在升起中的一族一国意识形态框架理解和塑造他处乃至欧洲的机制、缩影和困境。他们以小土伯特王国想象大土伯特; 大小土伯特概念之间的紧张类似二重知纳之间的紧张, 但“小土伯特”王国变幻无常, 是因为没有与土伯特对应的确定的王国, 是东方学的建构; “大土伯特”亦虚虚实实, 是因为当地文化世界的延展性; 省部知纳是几乎确定不变的, 与小土伯特王国不同; 而外围知纳虚虚实实, 类似大土伯特, 实朝贡体系所致。

越来越沉湎于族性地理学的欧洲学界只能从象征符号和概念上入手。

1671 年的《中国图志》中“Tibet”这一形式已经占据主导, 并且具备链接各个不同地方而使之组合成一个想象性地理单位的功能<sup>5</sup>。1686 年柏应理在著中提到泰定元年 (西历 1324 年) “来自 Tibet 王国的和尚 (指喇嘛)。”<sup>6</sup>这里的 Tibet 是汉文吐蕃的对译。根据吕布朗的意见, Tibet 和 Tebet 具有同一性关系; 当普查斯以族性地理思维把 Tebet 和 Tebeth 视为同一, 后者就跟 Tibet 同一。早在 1599 年至 1600 年的世纪之交, 哈克卢特已把 Thebet 与 Tebek 和 Tebet 等同; 1681 年摩尔把 Thibet 和 Thobrot 等同, 而伯立和耶稣会士们在 1620 年代即以 Thibet 跟卫藏相邻<sup>7</sup>。至此,

<sup>1</sup> 诺威克提到果定和 (Manuel Godinho, 1606)、鸠韦 (A. A. de Gouvea, 1613)、西利亚特 (G. A. Hiriart, 1622) 和安夺德都对大小土伯特做过区分。见 Braham Norwick, "Why Tibet Disappeared from 'Scientific' 16th -17th Century European Maps,"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arita 1989*, ed. Ihara Shoren and Ysamaguchi Zuiho (Narita: Naritasan Shinshoji, 1992), p. 637. 但当时这些材料大多没有发表, 而安夺德只提到 al Gran Tibet, 并未作出大小土伯特的区分。Andrade. *Lettere Annve Del Tibet Del MDCXXVI, E Della Cina Del MDCXXIV*. 1628. p. 3.

<sup>2</sup> Tavernier, Jean-Baptiste. *Collections of travels through Turkey into Persia, and the East-Indies*. London. 1684. p. 2: 134-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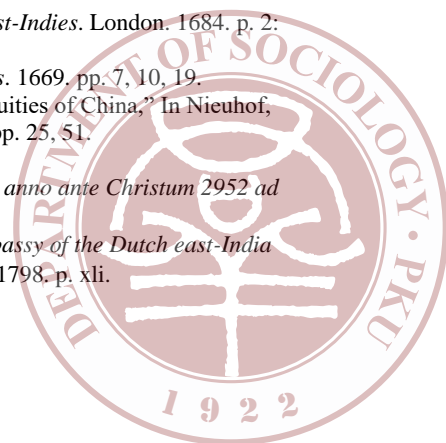
<sup>3</sup> Nieuhof, Johanne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1669. pp. 7, 10, 19.

<sup>4</sup> "An Appendix: or Special Remarks Taken at Large Out of Athanasius Kircher's Antiquities of China," in Nieuhof, Johanne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1669. pp. 25, 51.

<sup>5</sup> Montanus, Arnoldus. *Atlas Chinensis*. London: Tho. Johnson. 1671. pp. 668, 680.

<sup>6</sup> Philip Couplet.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juxta cyclos annorum 60 ab anno ante Christum 2952 ad annum post Christum 1683*. Paris. 1686. p. 77.

<sup>7</sup> 这个用法到 1798 年都存在, 那是向知纳朝贡的。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of 1794 and 1795, vol.1, 1798. p. xli.



Tibet 这个符号就基本上与各个时代的欧洲文献中的各种相关符号沟通，开始取而代之，向上溯及蒙元乃至史前时代，向其他区域近如卫藏、远如阿里、拉达克、康区、安多、塔布和工布等地，诉求自己的符号性霸权。<sup>1</sup>

斐萨 (Faria e Sousa, 1590-1649) 的《葡萄牙的亚洲》第二卷 (1674) 可能是新航路开辟以来第一部称土伯特为省 (the Province of Tibet) 的著作，而 1675 年该著第三卷则是我们所知最早称土伯特为帝国的。该书谈到安夺德在扎布让听知纳商人对他所讲前往卫藏、内地的日程、契丹是臣服于大索波的城市而非王国后用了“这个土伯特帝国 (this Empire of Tibet)”概念，<sup>2</sup>可能是为克服王国概念的有限性与长距离范围皆被想象为土伯特的地理单元之间的紧张；不过这一概念依旧无法克服二重土伯特的难题。

1693 年，博弘 (Edmund Bohun) 在《地理词典》中对土伯特王国的范围有两套不同的说法。其一是在涉及其邻近地域时提出的：土伯特在土耳其斯坦喀什噶尔王国和同名城市等以南；大莫卧儿帝国以北，东邻四川省和陕西省，西接乌兹别克。其二则是直接对土伯特范围所作的：“土伯特是亚洲鞑靼的一个王国；北边是鞑靼本部和沙漠鞑靼，南边是印度斯坦，东边是唐古特，西边是玛瓦纳特里亚 (Mawaralnatharia)。关于土伯特之名，人们所知不多。有人认为此即土耳其斯坦，有的则视为其一部。”<sup>3</sup>显然这两套说明所据的材料来自不同的文献，尚未进行整合，所以引起混淆是必然的。但无论怎样，这些说法都提出诸部在土伯特符号上的想象性而非事实上的统一议题。

## 二重知纳观和二重土伯特观的交织

德西德里在 1722 年也提到大小两土伯特 (deux Thibets)：小土伯特即巴尔蒂斯坦，大土伯特即博坦 (Buton, 类似阿卦维瓦、费其和卡塞拉等提到的博坦)，国王尼玛朗杰住在列城，亦称拉达克；从这里可达拉萨<sup>4</sup>。这一划分影响较大。1777 年地理学家米德尔顿 (C. T. Middleton) 在《新全地理系统》中就认为土伯特分为大土伯特、小土伯特和拉萨三部分，并无三土伯特之说。<sup>5</sup>德西德里对三个土伯特的划分要到十九世纪初期才得以公开发表：第一土伯特即巴尔蒂斯坦，第二土伯特即拉达克，或称拉达域 (Lhatà-yul)；第三土伯特即主要的土伯特，称博域 (Bodyul)，拉萨是其首府。这是目前我们所知欧洲最早触及博域这个概念的，其所指显然不包括整个青藏高原<sup>6</sup>。三个土伯特不包括奥拉济奥在 1730 年谈到的塔布、工布、康区和安多等地<sup>7</sup>。本质上说，这是欧洲人根据认知当地的先后而做出的，它反映的首先是认识进程，而不是地理分类；其次，他们去掉以当地为中心的视角，以此进程构筑一个地理分类，纳入正在建构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理分类体系之中。

这个分类系统何时才将土伯特从鞑靼范畴中分离出来？这必须考虑欧洲东方学中的符号和

<sup>1</sup> 一个当代的典型例子。美国学者诺威克谈到十七世纪欧洲地图中 Tibet 消失时说：“利玛窦前后的中文地图转写成西方文字后，也把西方地图中的 Tibet 消除掉。”当时 Tibet 这个用法在欧洲并未普遍，对土伯特的称呼也不固定，我们视这一表述为“Tibet”这个符号在寻求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霸权。Braham Norwick, "Why Tibet Disappeared from 'Scientific' 16th -17th Century European Maps,"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arita 1989*, ed. Ihara Shoren and Ysamaguchi Zuiho (Narita: Naritasan Shinshoji, 1992), p. 636.

<sup>2</sup> Faria e Sousa, Manuel de. *The Portugues Asia*. London. 1695. pp. 231, 338. 1678 年 Jonstonus (1603-1675) 在谈到以狗狩猎麝风俗时，也称土伯特为省 (the Province Thebet)。Jonstonus, Joannes. *A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e of four-footed beasts with their figures engraven in brass*. trans. by J.P. , Amsterdam. 1678. p.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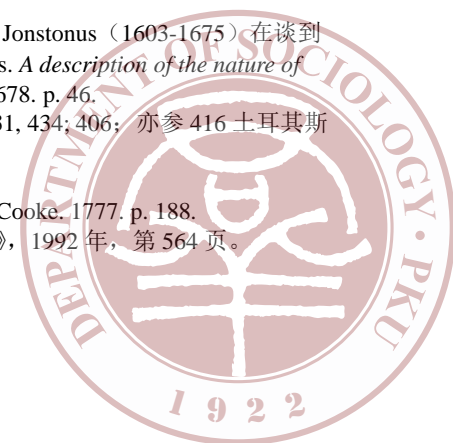
<sup>3</sup> Bohun, Edmund. *A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London. 1693. pp. 78, 211, 204, 391, 431, 434; 406; 亦参 416 土耳其斯坦条。

<sup>4</sup>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Vol. 15, 1722, pp. 188-90, 204.

<sup>5</sup> Middleton, Charles Theodore. *A new and complete system of geography*. London: J. Cooke, 1777. p. 188.

<sup>6</sup> Desideri, Ippolito. *II Tibet*, 1904. pp.24-25. 亦参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 年，第 564 页。

<sup>7</sup>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 年，第 510 页。





概念系统：这一分离跟知纳符号及其所指因鞑鞑之一建立大清而得到扩展、欧洲的二重知纳观和二重土伯特观在十八世纪初期真正交织并发生作用有密切关联。在东方学中，首先值得我们追问的是鞑鞑之一部建立的大清为何依旧称为知纳，而不称鞑鞑。根据散蒙的看法，除了发辫和风俗习惯外，帝国的法律是知纳的，首都、最高法庭、财富也在彼处，那里还授予学位和荣誉，所有人都归心于彼，可以说是鞑鞑臣服于知纳。<sup>1</sup> 这是欧洲基于民族-国家观念的理由；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根据大清自称“中国”。清廷在汉文和满语中都用这个概念。<sup>2</sup> 第三，闵明我在 1676 年根据利玛窦的意见，认为帝国的名字自伏羲以后即不变，但因统治家族不同而常有其他称呼，好比德意志帝国这个称呼永远不变，而奥地利家族统治时可以称奥地利帝国。<sup>3</sup>

1716 年，卡普清修会和耶稣会为争夺在拉萨地区的传教权，分别向罗马梵蒂冈教廷申诉。德西德里认为应由耶稣会传教，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西藏是属于中国（China）的，耶稣会已在中国工作将近一个半世纪。西藏既是中国的地方，所以它应划归属耶稣会传教的地区。二是从 1624 年起耶稣会士安夺德、卡塞拉和卡布拉尔相继在西藏阿里的古格和后藏的日喀则建立过传教会比卡普清在拉萨传教要早半个多世纪。因此，最早占领西藏（传教）和有权继承在西藏传教的应是耶稣会。”<sup>4</sup> 第一条理由填补二重知纳观中的空缺而模糊的地带；1730 年奥拉济奥的报告则涉及中国作为朝贡体系的议题：“在知纳的皇帝使自己成为土伯特之主以后，竹巴王国，拉达克或拉达，和尼泊尔皆臣服于土伯特，并自愿向土伯特朝贡。”<sup>5</sup> 第二条理由则以在古格和日喀则传教，即拥有整个 Tibet 的传教权，继承安夺德以该符号冠于各地之上的做法，有把 Tibet 普遍化和同质化的倾向，从而消除二重土伯特观的困境。

1776 年波格尔（George Bogle）及其随从从哈斯廷前往卫藏以后的报告中，述及十八世纪上半叶鞑鞑血统的知纳皇帝对土伯特拥有主权的过程，是他赋予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最高权威，两名汉人（Chinese）总督带三千军队驻扎拉萨<sup>6</sup>；1785 年格鲁贤（Grosier）也以中华帝国包容鞑鞑，将土伯特列入中华帝国的朝贡国行列<sup>7</sup>；这对欧洲地理学的影响显而易见。1800 年的两部地理学著作，维色（Vyse）的《新地理学指南》和温特（Vint）的《简明地理学体系》都依旧把土伯特列入鞑鞑范畴之中；<sup>8</sup>但两年后平克尔顿（John Pinkerton）的《现代地理学》中土伯特已经跟鞑鞑无缘，而转到中华帝国范畴之中。<sup>9</sup>

十八世纪前期因耶稣会和卡普清修会从拉萨发出的报告，后期因波格尔、特纳等的旅行记，欧洲关于西藏的地理知识急剧增加，其族性地理观则在理解这些地域中进一步推进。1802 年，平克尔顿在《现代地理学》中正式提出相对于不丹而言的“土伯特本部”这个族性地理概念。<sup>10</sup> 东方学的这一族性地理化进程把二重知纳观与二重土伯特观的交织作用和西方的汉学与藏学的分异带向更深入也更隐蔽的境地。

1827 年夏英国殖民当局孟加拉医疗服务处的医生吉拉德（Gerard）在列城的卡农（Kanum）

<sup>1</sup> Thomas Salmon. *Modern history: or,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 London: Messrs, etc. 1739, v1, p. 3.

<sup>2</sup> 安文思：《中国新史》，2004 年第 3 页；Magalhães. *A new history of China*. 1688. p. 4. 这个观点后来为赵冈发挥，见 Gang Zhao.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2006, pp. 4-23. 亦参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sup>3</sup> Navarrete, Domingo Fernández. *Tratados históricos, polí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Imprenta Real. 1676. pp. 2-4.

<sup>4</sup> 伍昆明：《早期基督教进藏传教史》，1992 年，第 587-588 页。

<sup>5</sup> Markham, Clements R. ed.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London: Trübner and co., 1879. p.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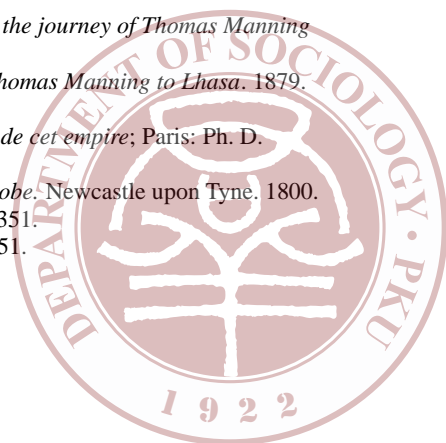
<sup>6</sup> Markham,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1879. pp. 9-10, 194-196.

<sup>7</sup> 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Paris: Ph. D. Pierres and Clousier. v. 13. 1785. pp. 2, 229-241.

<sup>8</sup> Vint, J. *A concise 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 or, a description of the terraqueous globe*. Newcastle upon Tyne. 1800. vol. 2, p. 5. Vyse, Charles. *A new geographical grammar*. London: R. Noble. 1800, p.351.

<sup>9</sup> Pinkerton, John. *Modern Geography*. London: A. Strahan. 1802. Vol. 2. pp. 145, 82-151.

<sup>10</sup> Pinkerton, *Modern Geography*. 1802. Vol. 2. pp. 145, 82-151.



村跟乔玛交谈过，得知他正在编纂藏文语法和字典。他在写给德里总督代办弗雷泽（W. Fraser）的报告中说：“如果知纳人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家，乔玛先生的文献研究，通过基于慈善而建立的友谊的中介，将最终产生更多的关注。”“在昆纳瓦尔（Kunawar）的北方边界，我到达两万英尺（6096 米），没有雪封山。我在如果不是知纳自身那就是其边疆看到一个荒芜而宏伟的景象。”在东边的司库诺（Skuno）村，“有一个寺院靠近知纳的边界，……旅行者在这里看到印刷文献，承载着知识，用柏木板捆起来，好似一劳永逸地合上。我带着知纳人翻译，他浏览其中一本，读了几段涉及科学的。”“在苏乐吉谷地，以及知纳领土内的若干地点，谷物种植成功。”<sup>1</sup>两年后报告在《政府志》上公开发表。跟一个世纪前的德西德里一样，吉拉德无疑把土伯特视为知纳的一部分。但在开创欧洲-西方现代藏学的乔玛的藏学研究中，这一关系被极大地模糊。他在“土伯特地理”一文中提到拉达克时说它处于土伯特西端，是其一部分，“依旧有自己的王子，但他必须调适自己于知纳人政治观。”而拉萨是“土伯特的商业首地，政府驻地，知纳安班（Ambans，或大臣）<sup>2</sup>驻地。”<sup>3</sup>但在两年后的字典中他却说安班（“ཨམ་བན་”）是“在土伯特的知纳人住民（resident），”英文 resident 有外交官、殖民地官员、情报人员等意思，用来翻译“驻藏大臣”都不适合。这就消去安班的根本属性。<sup>4</sup>正是这部藏英对照字典以欧洲-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族性地理学来塑造藏文化观念体系，为欧洲藏学奠定一个基本的框架。

## 结 论

本文主要研究十八世纪以前欧洲文献中有关藏文化区域的各种符号及其不同的所指跟相邻的地域概念之间的关系，梳理这些符号在欧洲现代早期经受其族性地理思想塑造、重组的历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历程跟欧洲人认知藏文化区域诸地的进程密切相关；其中由南亚尤其是拉达克而向拉萨这一方向的推进尤其关键；这是欧洲人传教和游历的进程。藏文化对各地的分类已经发挥作用，而更大的作用则是在十八世纪以后。

我们的结论是：首先，十八世纪以前，一定意义上乃至十九世纪初叶以前欧洲知识界对土伯特的认知是一部分人旅行经历的反映，是琐碎的，没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通过蛛丝马迹可寻出其联系性。构建内在一致性毋宁说是一个对符号和所指进行想象的过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土伯特的归属是由族性地理观和来自当地的信息在知识互动过程中确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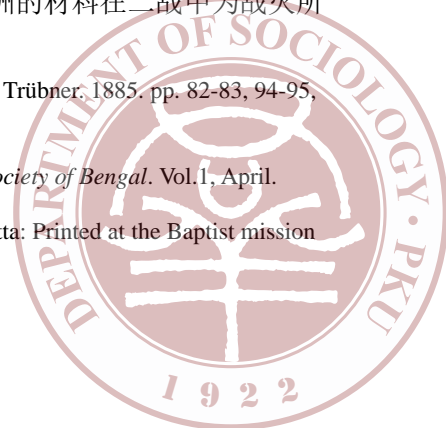
其次，这一进程极大地无视当地的事实，基本上忽略当地总体的文化世界特别是其内外关系，只在有限的和间接的意义上受到当地文化世界及其观念譬如汉文献中的记载和藏文化中地理分类的影响，以及历史事件譬如蒙元时期正式将吐蕃纳入中央朝廷治下的影响。因此，面对当地的地理分类体系，欧洲知识界极为坚持由欧洲人旅行活动而提出的地理分类，尤其是大小土伯特和三个土伯特的划分；这种坚持一度排斥新知，使得它在面临更为详尽的有关藏文化区的知识体系时不堪一击。范普特（Samuel van Putte）的例子对此有精彩的说明。他在 1725 年于印度的巴特纳见到从西藏返回的德西德里，后循他建议的路线前往拉萨。1731 年，他穿上清朝（Chinese）官服，跟随一名喇嘛，取道青海湖和西宁前往北京，四年后始达；后离开北京经另一线路返回。据信他经过康区和山南；他说：“途经各地的名字在我们的地图上未曾见过。”1736 年过半时回到拉萨，留待一年多以后，经西藏西部和克什米尔离开。甘多夫认为“没有哪个欧洲人像范普特那样获得有关西藏地理的第一手熟悉材料。……他掌握的藏语让他获得充足的细致信息，一丝不苟地写入日记、笔记和地图草图中。”1745 年范普特在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去世前，认为其知识处于不完美境地，遂让人将其旅行日志焚毁。幸存下来带回欧洲的材料在二战中为战火所

<sup>1</sup> Duka, Theodore. *Life and works of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a biography*. London: Trübner, 1885. pp. 82-83, 94-95, 97.

<sup>2</sup> 满语安班，汉译驻藏大臣。

<sup>3</sup> Csoma de Körös, Alexander. "Geographical notice of Tibet,"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 I, April. No. 4. 1832. pp. 122-24.

<sup>4</sup> Csoma de Körös, Alexander. *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 Calcutta: Printed at the Baptist mission press. 1834. p. 350.



毁。<sup>1</sup>

这结局是当地地理知识体系在欧洲族性地理分类系统中的命运的隐喻。当地的各种复杂关系在这些欧洲文献中只得到极其有限的反映；根本上这是由旅行活动来生产知识的特点。但是，这一知识进程却有一个诉求，就是成为一个知识体系，以替代或改造当地的世界观；无论何者，它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带上欧洲的族性地理分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知识必然且随时会遭受当地知识体系的挑战。如果欧洲地方生产的异域知识会带上权力面纱和权力诉求的话，当地知识体系也不缺乏权力面纱和权力诉求。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体系间相互的对话和挑战就跟政治体系间的对话、挑战乃至斗争合二为一。<sup>2</sup>如果我们不同时揭示当地的知识体系及其地理分类系统，我们将无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及其互动后果。

第三，欧洲现代早期的东方学中，“土伯特”是跟更大的政治体连在一起的，它曾从属于契丹、尤其是鞑靼和知纳这两个欧洲东方学界先后营造出的政治概念；欧洲现代藏学兴起后有模糊这种所属关系的倾向。这些涉及土伯特的符号或概念的变动，除了当地历史有某种重大的变动外，欧洲东方学中用以理解这些变动的概念性框架体系至关重要。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

<sup>1</sup> Markham,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1879, pp. lxii- lxxv. Gandolfo, *Bhutan and Tibet in European Cartography (1597-1800)*, pp. 107-110.

<sup>2</sup> J. B. Harley, "Silences and Secrecy: The Hidden Agenda of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mago Mundi*, Vol. 40 (1988), pp. 57-76. See also Anand, Dibyesh.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